



unesco

# 遗产保护 6

## 助力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 2021 年出版

© UNESCO 2021



此出版物为开放获取出版物，授权条款为 Attribution-ShareAlike 3.0 IGO (CC-BY-SA 3.0 IGO)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igo/>)。此出版物内容的使用者无条件接受遵守教科文组织开放获取储存档的一切条件和规则 ([www.unesco.org/open-access/terms-use-ccbysa-chi](http://www.unesco.org/open-access/terms-use-ccbysa-chi))

本出版物所用名称及其材料的编制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任何国家、领土、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于其边界或界线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本出版物表达的是作者的看法和意见，而不一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看法和意见，因此本组织对此不承担责任。

主要撰稿人：李艳霞、赵昱、钟媛、孔萍  
项目团队：古榕、卢叶、高思嘉、姚心宜  
评审：景峰  
装帧设计：庄兆滨  
印刷：联合国教科文驻华代表处  
封面照片：石林彝族撒尼刺绣传承人群 © 张俭

本出版物在 UNESCO -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梅赛德斯 - 奔驰星愿基金《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和》项目三期 (2017-2021) 框架下编写出版



# 摘要

## 中国文化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 相协同的研究与探索



过去 40 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 **7.7 亿** 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 **70%**

促进保护和发展协同并进是当下国际与国内社会的共同诉求。中国作为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以及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不断加速的城镇化进程、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中，一直致力于平衡遗产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

当前，包括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中国十三五、十四五发展规划在内的国际国内发展议程都愈发重视文化活化利用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 2017 年起，联动国际国内发展议程和机构使命，以可持续生计为载体、中德文化交流为窗口，就遗产地保护和发展协同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

本书介绍了国际与国内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以案例的形式总结了文化在消除贫困、促进性别平等、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提升世界遗产地韧性、推动乡村振兴中的巨大潜力。

# 序

我很高兴能向各位读者介绍这套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梅赛德斯 - 奔驰星愿基金的长期资助以及与合作伙伴的互信合作之上出版的《中国世界遗产能力建设手册》系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和管理》项目自 2007 年启动以来一直在探索平衡遗产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创新机制。在此项目框架下编写的《中国世界遗产能力建设手册》立足于权威机构和专家的学术研究，凝聚了世界遗产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当地社区多年试点活动积累下的经验和案例，在中国语境下提供了关于有效管理和利用文化和遗产以促进可持续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的前沿知识和优秀实践。

中国在遗产保护和文化发展方面的经验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拥有丰富而多样的遗产资源，而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过去 40 年间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在创造就业机会、在让 7.7 亿人脱贫的同时，也带来了自然资源过度开发、传统景观改造和乡村空心化等问题和挑战。

这一系列出版物强调了文化既是一个能够带来直接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行业，同时也作为“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部分，对提升各行各业的高质高效运行都做出着贡献。2015 年，随着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通过，国际社会愈发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在创造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保护环境以及建设和平和包容性社会方面的强大作用。

国际社会对文化的重视也为成员国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将文化系统性纳入政策制定，通过发展可持续旅游、文化创意产业以及文化导向型乡村振兴等工作，激发地方发展潜能。当然，这并非易事。无论是政府部门、传承人和文化从业人员还是媒体、社区民众，都需要提升对文化和遗产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了解，另一方面为应对当今文化和遗产面临的种种挑战，我们更需要去思考并提出富有创造力的解决方案，让可持续发展能够切实普惠每一个人。

在新冠肺炎疫情阴影笼罩之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化和遗产来激发团结精神和社会包容，克服种种挑战，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目标。《中国世界遗产能力建设手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分享知识和优秀实践、促进对话以及和平与繁荣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之一。我们相信，这一系列出版物有望为中国四万六千余名遗产保护管理专业人员提供有益参考，并激发关于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更广泛对话和探索。



**夏泽翰 教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日本国、  
蒙古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代表

# 目录

## 1. 战略与政策层面：遗产保护助力可持续发展 8

## 2. 实操和落地层面：

### 遗产保护助力可持续发展中国案例 11

#### 2.1. UNESCO 项目背景：

探索遗产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 11

2.2. 项目理念和策略 12

2.3. 促进减贫与公平发展 14

案例一：创新活化传统撒尼刺绣，促进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  
——中国南方喀斯特云南石林撒尼刺绣试点 14

案例二：通过竹子和创意振兴乡村，促进城乡协同、平衡发展  
——中国丹霞世界遗产地赤水竹手工艺可持续生计活动 25

案例三：多种非遗融合创新 助力减贫和性别平等  
——贵州梵净山松桃苗绣试点 41

2.4. 改善自然环境并使之更加可持续 53

案例四：依托遗产资源开展高山养蜂和自然教育，促进世界遗产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区发展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遗产地雅安和卧龙养蜂可持续生计活动 53

2.5. 促进国际社会参与 64

案例五：全球多边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文化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德文化交流“遗产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 64

## 3. 常见问题 Q&A 80

# 1

## 战略与政策层面： 遗产保护助力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念最早由国际环保机构提出，源自 1980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与野生动物基金会（WWF）联合发布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是一种有关自然、科技、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在此基础上，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布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做了进一步阐述，得到了普遍认可，也被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网站采用：“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理念体现了人类社会代际公平、和谐共享的原则。

2015 年 9 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UN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是未来 15 年全人类的共同发展目标。议程中的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 个子目标旨在巩固和完成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使全人类享有人权，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是为人类和地球建设一个具有包容性、可持续性和韧性的未来。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关键是协调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环境保护这三大核心要素。这些因素是相互关联的，对个人和社会的福祉都至关重要。在三大要素的协调中，文化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基于文化的重要性，《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文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纳入国际发展框架中，这是文化首次被纳入国际发展议程。《议程》宣称“我们承认自然和文化多样性，认识到所有文化与文明都能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议程》的颁布传达了一个关键信息：缺乏文化视角的发展必定是不可持续的。在目标 11“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下，明确提出了具体目标 11.4“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1972 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蕴含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是对可持续发展的巨大贡献。在公约操作指南中提出了“可持续使用”的概念，肯定了存在多种现有的和潜在的使用世界遗产的方式，如果利用方式恰当且可持续，可以促进世界遗产地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并通过促进绿色经济和可持续旅游的发展，为当地吸引投资、创造就业岗位和体面工作。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也界定了只考虑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作为联合国系统中唯一在文化领域负有使命的智力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文化的角色在包括优质教育、可持续城镇、环境、经济增长、负责任消费和生产、公正和谐和包容社会、性别平等以及粮食安全等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均有所体现。从文化遗产到文化与创意产业，文化在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既是促成者也是驱动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文化多样性的工作及相关的文化公约，是实现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键。



中国高度重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率先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在目标11.4下，提出“执行《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风景名胜区条例》和《博物馆条例》，到2030年，保障公众的基本文化服务，满足多样化的文化生活需求。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到2020年，参加研修、研习和培训的非遗传人群争取达到10万人次”。同时将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国家发展规划进行有机结合，在《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文化市场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发挥，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文化产业在“十三五”末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通过以上国际和中国发展议程和纲要的梳理，可以看出文化已经被纳入可持续发展议程，整体政策环境良好。在中国的语境下对文化的解读包括了自然和文化、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概念更加综合全面，并且对于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式。于此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全球化和社会转型在促进经济发展和为不同群体间创造新的对话的同时，也为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在缺乏保护资源的情况下。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不仅从保护，更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遗产。不仅需要通过行政、法律、教育等手段，更需要通过创新的方法，发挥遗产的活力和韧性。不仅需要保证遗产本体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承担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

# 2

## 实操和落地层面： 遗产保护助力 可持续发展中国案例

### 2.1. UNESCO 项目背景：探索遗产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

中国不仅有悠久历史文化，也有着幅员辽阔、地貌丰富、气候多样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1985 年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2004 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截至 2021 年 8 月，中国共有世界遗产 56 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40 项，都位居世界前列。于此同时，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城镇化率从 1985 年的 23.71% 增长到 2020 年的 63.89%。这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传承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包括土地开发利用的需求和遗产保护间的矛盾，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与自然资源开发限制的矛盾，强制性保护措施和补偿机制缺失之间的矛盾，因生态恢复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再就业与持续发展的矛盾，城市“千城一面”威胁文化多样性的矛盾、旧城改造和错位开发影响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矛盾、乡村“空心化”导致遗产保护和传承断档等。同时由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原有的生存空间，有的非遗技艺后继乏人，面临着消失的危险，需要寻找文化遗产和现代生活的结合点。

因此，作为世界遗产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平衡遗产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成为中国面临的挑战之一。为探索可行的解决之道，自 2007 年起，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梅赛德斯 - 奔驰星愿基金的持续资助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发起了《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和管理》项目，通过能力建设和规划制定提高中国世界遗产地，特别是新列入的自然遗产地的保护和管理水平。基于多年的经验和思考，特别是 2008 年汶川地震和 2013 年雅安芦山地震带来的影响，自 2017 年起，UNESCO 开启了世界遗产地可持续生计试点活动。鉴于理念的高度融合，2019 年 UNESCO 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携手开启了非遗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总结推广非遗扶贫、乡村振兴的中国经验，为遗产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 2.2. 项目理念和策略

---

世界遗产地可持续生计是指以世界遗产地为载体，以遗产地特有的绿色生态产品和 / 或非遗传代表性手工艺为切入点、以创意为驱动、以文化经济为导向的遗产地社区生计发展模式。通过协同自然和文化、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世界遗产地社区居民提供或优化可持续的生计方式，发挥文化在消除贫困、促进性别平等、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提升世界遗产地韧性中的巨大潜力，推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在试点世界遗产地的选择上，遵循以下标准：有相关的绿色生态产品和 / 或非遗传代表性手工艺、当地政府高度重视遗产和非遗保护、政府机构愿意参与此项活动并提供配套资源以确保活动目标的实现、有恰当的管理机构设置和足够的人员能力实施项目，以及当地社区有一定基础和意愿加入项目。

在非遗传代表性手工艺和绿色生态产品的选择上，遵循以下标准：最具独特性、环保性和可持续性、对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有贡献的传统知识和技艺，以及能够产品化并主要由遗产地内及周边社区生产。

基于以上标准，经过与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管部委商议，目前项目下涵盖四处世界遗产地试点分别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遗产地雅安和卧龙、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地云南石林、中国丹霞世界遗产地贵州赤水、梵净山贵州松桃。试点遗产地全部为世界自然遗产地，包括极具代表性的、同时也是中国遗产地面积排名第三的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中国第一个系列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中的云南石林，也包括少数民族众多、扶贫攻坚重点省份贵州的两处世界自然遗产地。所选择的非遗代表性手工技艺包括国家级和省级非遗元素，选

## 世界遗产地可持续生计

协同自然和文化、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世界遗产地社区居民提供或优化可持续的生计方式,发挥文化在消除贫困、促进性别平等、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提升世界遗产地韧性中的巨大潜力,推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b>1 消除贫困</b>	<b>具体目标1.5</b> 增强穷人和弱势群体的抵御灾害能力,降低其遭受极端天气事件和其他经济、社会、环境冲击和灾害的概率和易受影响程度	
 <b>4 优质教育</b>	<b>具体目标4.4</b> 大幅增加掌握就业、体面工作和创业所需相关技能,包括技术性和职业性技能的青年和成年人数量	
 <b>5 性别平等</b>	<b>具体目标5.b</b> 加强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以增强妇女权能	
 <b>8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b>	<b>具体目标8.3</b> 推行以发展为导向的政策,支持生产性活动、体面就业、创业精神、创造力和创新	<b>具体目标8.9</b> 制定和执行推广可持续旅游的政策,以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地方文化和产品
 <b>10 减少不平等</b>	<b>具体目标10.2</b> 增强所有人的权能,促进他们融入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而不论其年龄、性别、残疾与否、和族、族裔、出身、宗教信仰、经济地位或其他任何区别	
 <b>11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b>	<b>具体目标11.4</b> 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b>15 保护陆地生态</b>	<b>具体目标15.4</b> 保护山地生态系统,包括其生物多样性,以加强山地生态系统的能力,使其能带来对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益处	
 <b>17 全球伙伴关系</b>	<b>具体目标17.16</b> 加强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以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作为补充,调动和分享知识、专长、技术和财政资源,以扶持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取的绿色生态产品具有天然地理优势,并且非遗技艺和传承人群的分布与世界遗产地的地理范围重合度高,有利于项目的组织和推进。这四处试点遗产地以及非遗元素、绿色生态产品的选择很好的体现了自然和文化、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融合,是阐释遗产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生动案例。

项目的实施策略包括研究和基线数据调查、确定项目目标和执行方案,通过能力建设、规划标准制定、意识提升、平台搭建等方式,推动政策制定和资源整合。项目起到种子基金作用,强调当地政府和社区的所有权和积极性,号召和吸纳多方平台和资源,注重试点间横向交流和跨部门、跨领域、跨国界纵向交流,形成合力推动政策和标准的制定,将遗产纳入发展规划,推动营造社会参与遗产保护的氛围。



石林 © 李昆

## 2.3. 促进减贫与公平发展

### 案例一：创新活化传统撒尼刺绣，促进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中国南方喀斯特云南石林撒尼刺绣试点

#### 1. 背景介绍

石林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旅游观光地，早在 1931 年就建园开发，1982 年成为全国首批 44 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2001 年被命名为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8 年被命名为首批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2004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首批世界地质公园，2007 年作为“中国南方喀斯特”系列遗产的组成部分之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南方喀斯特是全球热带亚热带喀斯特地貌中最为壮观的代表，而云南喀斯特历经 2.7 亿年的演化，以其丰富的形态多样性和色彩变化成为世界上石林地貌最奇特的景观和最典型的参照。在 120.7 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和 229.3 平方公里的缓冲区范围以内，分布着不同时期、不同

发育阶段和不同类型的喀斯特地质地貌景观，包括石林、石峰、石芽、岩沟、溶洞和溶蚀湖泊。也是在相同的地理范围内，生活着六万多原住民，其中大部分是彝族撒尼人。彝族支系众多，撒尼人是其中一个支系。据估计，全国撒尼人口 10 万余人，其中约 6 万人聚居在石林县。石林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撒尼人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以阿诗玛为代表的彝族文化内涵丰富，被誉为“歌舞之乡”、“摔跤之乡”、“现代民间绘画画乡”，2019 年 1 月被文化和旅游部评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石林拥有四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彝族大三弦舞、彝族撒尼叙事长诗阿诗玛、彝族摔跤、和彝族（撒尼）刺绣。彝族撒尼刺绣是彝族撒尼人世代相传的传统工艺，当地人称撒尼挑花，彝语叫“拿窝”，意为未绣完的挑花。据考证，撒尼挑花起源于唐宋时期，成熟于明、清时期。它伴随着彝族撒尼人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沉积下来的特殊工艺文化，凝结着撒尼人对民族文化、生活价值观念、审美价值、宗教信仰和对世界的认知。2008 年 6 月，“彝族（撒尼）刺绣”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文化在石林的解读包括文化和自然、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融合，是一种全面综合的视角。从世界遗产名录而言，石林是一个自然遗产地，但它的价值具有多个层次，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地质地貌价值相辅相成。中国很多世界遗产地也具有同样的特点。

## 2. 遗产面临的挑战

从世界遗产的角度来看，石林成为世界遗产地后，为保护喀斯特资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土地、矿产、石材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影响了当地农村社区的经济。尽管石林的



彝族（撒尼）刺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毕跃英代表作《星光灿烂》

旅游业发展较好，但其收入来源相对单一，约 77% 来自门票。除了临近景区入口的村落外，核心保护区的 32 个村寨和缓冲区的 39 个村的村民并没有能成为游客增长的直接受益人群，依然靠着传统农耕、务工等方式维持生计。据 2018 年编制的《石林世界遗产地撒尼刺绣可持续发展调查报告》，调查的四个村落中最低人均收入为 0.3 万元 / 年，建档困难户共 16 户。四个村落中，从事刺绣行业的人员在全村人口占比中较少，且从事手工刺绣的人收入不高，对于家庭经济而言并无太大助益。但是值得肯定的是，从事刺绣产业人员收入相较于其他生计方式而言，收入相当乐观。

从撒尼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的角度来看，撒尼刺绣是中国刺绣大家庭的一员，相较于四大名绣，撒尼绣更具独特的地域特色、民族民间特色，同时也面临着更严峻的产业生态生存环境，迫切需要得到保护和传承。目前面临的挑战如下：

### 1) 生活环境和方式发生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传统工艺逐渐脱离了原有的生产力关系和社会需求，刺绣产品逐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 2) 刺绣技艺后继乏人

手工刺绣技术难度大，习艺制作周期长，成本高昂，加之年轻人多不愿学，老艺人相继去世，刺绣技艺后继乏人，刺绣手工艺品市场供给量少，传统手工撒尼刺绣产业难成气候。



毕跃英和绣娘们 © 张俭

### **3) 机器化生产带来冲击**

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类似的机器制品以其低廉的价格和大批量的产出，给传统手工刺绣品带来巨大的冲击，进一步缩小了原本就很小的手工刺绣品市场规模。

### **4) 行业市场规范严重滞后**

石林彝族刺绣产业缺乏系统的发展规划，没有地方标准，没有集中的设计、生产、加工、销售、展示的区域和规范统一的市场，刺绣企业“小、散、弱”现象突出，缺乏带动力，缺乏竞争力。对比南京云锦、苏绣、贵州苗绣都分别于2008年、2010年、2012年成功申报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石林彝族刺绣的规范化发展已严重滞后。

### **5) 产品研发创作严重落后**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石林刺绣产品多为机绣产品，设计粗糙、缺乏创新，品质低、利润小。流传了千百年的彝族手工刺绣产品由于缺少现代时尚元素，加工工艺落后，生活实用性不强，没有转化成高品质、有创意、现代化的旅游商品，满足不了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和消费习惯。

### **6) 销售渠道萎缩**

目前撒尼刺绣手工艺品的销售渠道还是主要依靠线下零售、政府采购、展销和专业化市场等传统形式。随着电子商务、微营销等现代营销手段的发展，大量消费者的购买场景从线下迁移到线上，线下零售业收到了冲击石林撒尼刺绣手工艺品的市场营销跟不上技术的进步和商业模式的巨变。

### **7) 龙头企业带动作用缺失**

刺绣产业的发展与振兴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带动和订单，目前，石林虽然有以毕氏刺绣、七彩美伊等为代表的刺绣加工、销售企业，但其产品主要以机绣为主，对民间绣娘的带动作用不大。石林还没有一家专业设计、生产手工刺绣旅游商品的企业，民间绣娘没有企业订单、刺绣还处于自给自足状态。

### **8) 忽视品牌建设**

撒尼刺绣虽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却不像阿诗玛一样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地政府和企业对刺绣产品的品牌建设和营销力度不够，对产品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挖掘不深。而这又根源于撒尼人的历史文化。长期以来，撒尼刺绣作为自用和礼物而存在。在产业化过程中，刺绣品以商品的形态被纳入市场交换体系中的时间并不长久，没有培育出百年老店，也没有知名品牌。



以上列举的这些挑战是很多世界遗产地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共通的挑战，需要挖掘文化遗产中具有活力的基因，建立文化遗产和现代生活的有效连接。

### 3. 采取的对策

石林世界遗产地可持续生计试点活动选择以撒尼刺绣非遗为基础的创意产品为切入点，通过开展基线数据调研、能力建设、意识提升、刺绣产业规划和标准制定、文化交流等活动，推动文化区域公共品牌的建设，依托遗产地游客流量，探索创新遗产地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并提升其竞争力，促进刺绣产业发展，帮助遗产地走特色化可持续发展之路。采取的对策如下：

#### 1) 人才培育——增强劳动力优势

考虑到撒尼刺绣非遗面临的后继乏人、缺乏创新能力的挑战，项目下于 2018 年在石林世界遗产地开展了一期刺绣技艺传承和创新设计培训班，参训人员 62 人，其中 58 人为女性，辐射石林县各村寨绣娘和企业职工 600 余人。这些学员构成覆盖了石林彝族撒尼刺绣产业各个主管部门和刺绣产业链的各环节，具有较高的代表性，他们将成为石林彝族撒尼刺绣产业发展的主力。之后组织开展的撒尼刺绣文创产品设计大赛吸引到了全国各地 176 份参赛作品，启发了如何将传统刺绣向旅游创意商品进行转化的思考，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展示机会，使得刺绣和设计人才脱颖而出，为下一步实现部分产品量产和设计生产计划提供了人才和资源储备。



2018 年石林撒尼刺绣可持续生计培训班 © 王丽梅

以此为基础，在国际层面，石林组织 4 位遗产地代表和非遗传承人参加了 UNESCO 于 2018 年 9 月组织的中德文化交流活动。在国内层面，于 2019 年 3 月组织了石林县关部门领导、刺绣行业骨干企业家以及部分非遗传承人代表共 54 人，赴贵州参加苗绣文化交流学习。主要交流内容包括全域旅游带来刺绣艺术品的机遇与挑战、刺绣人才培养方案及产品营销手段创新、刺绣艺术品营销创新、刺绣带动妇女居家就业创业脱贫致富、刺绣产业发展模式探讨、传统刺绣与时尚元素融合及电商销售解决方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积极协调下，交流团还考察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凯里苗族刺绣项目，并与项目负责人、专家以及凯里市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交流与学习。

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可持续生计活动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非遗+扶贫”工作的高度契合，2019 年 9 月两方达成了非遗可持续发展合作。在此框架下，2019 年 11-12 月，在文旅部、教育部、人社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框架下，由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承办了“世界遗产地可持续生计项目石林撒尼刺绣技艺非遗品牌智造研修班”。此次研修班专门面向 UNESCO 世界遗产地可持续生计的 3 个试点开展。研修期间，文化和旅游部原副部长项兆伦为全体传承人学员带来了《我国非遗保护的理念和实践》专题讲座，强调非遗保护要“见人见物见生活”，非遗培训也要遵循“强基础、拓眼界、增学养”这一工作理念。此次培训有力地促进了遗产地间的横向交流和合作，并有助于加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工作和文旅部“非遗+扶贫”重点工作的融合。

自启动可持续生计活动以来，210 名当地绣娘和刺绣从业人员从能力建设和文化交流活动中直接获益，其中 87% 为女性，辐射人群达到 3400 人。撒尼刺绣相关领域人员的理论素养和技能水平获得全面提升，石林传统撒尼刺绣手工艺品的产品创新和产业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为下一阶段的项目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2) 建立多方合作伙伴关系 - 国际和国内平台合力推动

在 UNESCO 的推动和协调下，目前已建立起多方合作关系，由文旅部非遗司提供总体咨询和支持，相关高校和专家提供技术指导，石林县成立“撒尼刺绣产业工作领导小组”。项目的成果通过不同的平台得以展示，包括以案例的形式被纳入 UNESCO《文化 2030——城乡发展：历史村镇的未来国际会议》成果出版物，展示中国在推动乡村振兴上的创新性政策和实践。该出版物已登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供全球免费下载<sup>1</sup>。

在文旅部非遗司的倡议下，应第七届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执委会邀请，UNESCO 参加了 2019 年 10 月在成都举行的“非遗传承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专题展”并设机构展区，展示了世界遗产地可持续生计领域的成果，石林撒尼刺绣文化创意产品和理念作为重点得以

---

1. Culture 2030: rural-urban development: China at a glance; the Meishan experience, conference edition.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68646>



石林彝族（撒尼）刺绣技艺及产品亮相第七届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  
© 虎志光

展示。成都国际非遗节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为非遗保护举办的第一个国际性节庆活动，本次非遗节共吸引了86个国家的5600余人参加，共举办了540余场活动、覆盖1100余个非遗项目。

作为联合国在华发展四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联合国驻华机构合作举办的“回首四十载，合作促发展”纪念展览活动于2019年10月22日在中国商务部开幕。时任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罗世礼，以及非盟驻华代表奥斯曼为本次纪念展览活动致开幕辞。来自政府部门、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80多位中外代表共同参加。展览期间，阿诗玛玩偶传统刺绣服饰作为UNESCO项目下可持续生计活动的代表进行展出。传统刺绣服饰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彝族（撒尼）刺绣代表性传承人毕跃英于2018年制作，也是UNESCO唯一的实物展品。

作为UNESCO项目的延申和互补，2019年3月，梅赛德斯-奔驰星愿基金-UNESCO世界遗产地可持续生计项目发起首个世界遗产地女性发展计划“巾帼梦”，与梅赛德斯-奔驰专属女性平台She's Mercedes创新联动，共同聚焦女性发展议题。石林撒尼刺绣国家级传承人毕跃英女士和赤水竹编传承人杨昌芹女士加入“巾帼梦”计划，分别与She's Mercedes平台会员、著名时装设计师Masha Ma女士和国际知名建筑师胡如珊女士跨界合作，打造刺绣元素时尚单品和竹编元素创意家居产品。这也是对传统手工艺和现代生活相结合的一个有益尝试。

简言之，经由联合国和中国的各种平台资源，石林撒尼刺绣非遗可持续发展的探索在国际和国内的相关政府、机构和非遗从业人群中得到了宣传和推广。

### 3) 当地政府主导——提供组织和资金保障

在当地层面，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成立了撒尼刺绣产业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县长任组长、县委副书记和分管传统文化产业的副县长任副组长、县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研究制定有关政策措施，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大事项和重大问题。



石林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和部分项目团队成员 © UNESCO

在领导小组的带领下，石林县的层面成立了跨部门的合作机制。县文化和旅游局积极争取上级文旅部门振兴民族传统工艺项目资金，大力培育刺绣非遗传承人，培树工匠典型；在文旅部“非遗+扶贫”重点项目理念、目标、实施策略和工作内容指引下，扶植建立并强化本地合作社、工作坊和家庭刺绣工坊等，带动周边社区居民就业。县妇联发挥组织协调联系作用，组织发动绣娘和刺绣企业积极参与刺绣产业发展。石林管理局通过实施世界遗产地社区可持续生计试点活动，推动刺绣手工艺合作社，刺绣扶贫工坊建设。县财政局整合各有关部门培训资金，筹资对刺绣产业进行扶持投入。县市场监管局加强品牌培育，逐步培育一批驰名商标，推动形成一批具有较大影响的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申报石林彝族刺绣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县工信局培育扶持刺绣产业集群建设，创新营销模式，积极组织刺绣电子商务企业申报省、市奖励项目。县人社局争取并筹集培训项目资金、资源，积极争取省人社厅创业孵化基地项目，推进刺绣非遗文化街建设。

经过多方的努力，已经初步建立了组织和经费保障机制。外部的资源和推动激发了当地的主动性，当地政府已经将撒尼刺绣非遗提升到产业规划的战略高度，这也是 UNESCO 倡导的文化融合助力可持续发展的当地实践的体现。



“巾帼梦”计划框架下著名时装设计师 Masha Ma 与石林彝族（撒尼）刺绣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毕跃英合作设计的刺绣元素腰包 © 梅赛德斯 - 奔驰

#### 4) 文旅融合——抓住文旅融合的大趋势，与旅游业合力互补

石林风景区素有“天下第一奇观”之称，也是云南省的标志性旅游目的地。2019 年石林风景名胜接待游客 407.87 万人次，其中境内游客 394.58 万人次、境外游客 13.29 万人次，实现旅游直接收入 6.58 亿元，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3.11 亿元。然而，游客流量带来的综合效益不高，时间短，更以自然风光为主，没有形成完整的消费链。在观赏游览的过程中，无法深入了解和体验撒尼文化的丰富多彩，没有发挥出地域文化特色的优势。

在石林旅游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在特色旅游线路产品的深度开发中，可以依托其丰富的非遗资源打组合牌。石林众多非遗中，阿诗玛的影响最大，火把节也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节日，每年有超过 10 万游客参与。两者的强强结合，并以刺绣作为体验式旅游的载体之一，可以打造石林旅游的新形象。2018 年火把节前，石林遗产地多平台、多渠道展示“阿诗玛、阿黑哥”旅游 IP 形象，并展示了撒尼刺绣与阿诗玛文化 IP 相结合的文创产品，吸引全国 30 多家媒体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报道，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

整体品牌形象建立和事件营销的推动，加上石林遗产地每年百万以上的游客流量，再加上旅游市场对特色旅游纪念品和刺绣体验的需求，传承刺绣非遗和大力发展刺绣产业，以推动石林的旅游业发展和地区经济转型，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 5) 以产业规划和技术标准促进刺绣产业创新发展

在 UNESCO 项目的推动下，石林县于 2019 年 8 月完成了《石林彝族（撒尼）刺绣产业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编制，通过该规划具体部署未来五年内当地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在刺绣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各项工作，规范和引导社会资源参与撒尼刺绣产业创新发展。在此基础上，2019年10月30日出台了《石林彝族自治县关于推进彝族刺绣产业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发展目标，列入考核指标，出台扶持政策，形成工作合力、政策合力、资源合力。石林撒尼刺绣产业发展已被纳入《石林彝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2021-2025年）规划》当中。

同时，石林县编制了《云南昆明石林撒尼刺绣地方标准》，以地方标准的形式保护撒尼刺绣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保证产品质量并规范市场交易行为，为该产业的长期规范化发展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制定、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明确刺绣的原料、主要工艺、图案设计、工艺要求、工艺流程、产品质量等，扩大产品美誉度和知名度，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一方面通过建立地方标准，固化并保护了撒尼刺绣的地域文化独特性，一方面又通过产业发展规划，整合各方资源，基于撒尼刺绣传统工艺的文化元素和内涵，并适应现代生活需求，采用不同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开发具有石林地域文化特色的刺绣文创产品，使其具备艺术性、实用性和文化附加值，从而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让刺绣产品火起来。



石林“阿黑哥 阿诗玛”  
旅游 IP 形象 © 卢叶 /  
UNESCO

## 6) 挖掘非遗品牌核心价值——独特的地域文化价值

品牌建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的合理路径之一。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注意非遗品牌化的特殊性，需要强调非遗的文化内涵，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消费符号。在石林撒尼刺绣非遗品牌建设的过程中，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体现在自然和文化、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有机融合。以世界遗产为载体，叠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拥有国际国内权威体系认证

**100+** 刺绣就业岗位创造



**20+** 个地方政府部门联动机制建立



推动撒尼刺绣产业纳入石林县十四五发展规划

制定《石林地区彝族（撒尼）刺绣地方标准》



**260** 人次绣娘和从业人员直接受益  
(87%女性)

**3400+** 人间接受益

和平台资源、产业优势等特点。这些核心竞争力，是国内 56 处世界遗产地、16 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少数民族刺绣技艺难以具备的，是石林撒尼刺绣非遗品牌建设的竞争优势。

可以依托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品牌的差异化定位，并借力 UNESCO 世界遗产地可持续生计活动，联合其他世界遗产地和多项非遗，以文创产品为载体，塑造有别于故宫宫廷文化的世界遗产地地域品牌形象。

#### 4. 经验和思考

石林撒尼刺绣品牌建设案例对于 UNESCO 而言，突破了相关特定文化公约的框架，为探索《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融合提供了借鉴，并提供了文化如何促进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在地案例。对于中国而言，此案例在国际的推广可以有助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彰显作为文化大国的责任和贡献；在国内的推广可以提供“非遗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鲜活案例，符合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对于石林而言，UNESCO 项目促成了撒尼刺绣上升至产业规划的高度，纳入石林县十四五发展规划，为当地经济振兴、旅游经济的转型提供了推动力，有助于以绿色产业保护世界遗产和传承非遗，造福于当地社区。对于其他手工艺类非遗而言，其非遗品牌核心价值的挖掘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综合的视角，同时考虑自然和文化资源，以文创产品的形式，以地理标志产品和证明商标为路径建立区域品牌。其非遗品牌建设的过程也提供了多方利益相关者如何协作的宝贵经验。



中国丹霞贵州赤水© IUCN

## 案例二：通过竹子和创意振兴乡村，促进城乡协同、平衡发展 ——中国丹霞世界遗产地赤水竹手工艺可持续生计活动

### 1. 背景介绍

#### 1.1. 问题的产生

贵州省赤水市地处黔西北，与四川省接壤，土地面积 1852 平方公里，其中 1200 平方公里为丹霞地貌。赤水全市处于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过渡地带，地质地貌切割剧烈，海拔跨度从 221 米到 1730 米。由于地处长江上游，这一区域同时还是长江流域重要的保护屏障，具有极高的生态保护价值。丹霞地质特殊的松软特征，加之长期的农耕作业，九十年代时期，赤水全市 32.5% 的土地存在严重的水土流失，雨季易发洪水、滑坡等地质灾害，生态极其敏感与脆弱。

2010 年 8 月 1 日，“中国丹霞”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贵州赤水丹霞地貌作为青年早期丹霞地貌典型代表，成为“中国丹霞”6 个提名地之一。为加强对赤水丹霞地貌的保护



与管理，2011年，遵义市设立了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赤水市加大了对自然资源 and 环境的严格保护，禁止危害生态环境的开发建设行为及部分生产生活活动。而赤水全市31万人口，其中74%为农业人口，严重依赖土地资源维持生计。在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地721.78km<sup>2</sup>的范围内（图1），生活着约2万5千人，多数较贫困。近年来，虽然随着旅游的开发，游客数量的增加，为靠近旅游展示区的居民带来了一定的收入。但据调查，自申遗成功以来，遗产地核心区范围内，远离旅游展示区的部分居民，受到禁建、禁猎和禁伐的影响，年均收入反而有所下降。迫于生计，仍有部分在遗产地范围内从事生产生活，这对遗产地的保护构成压力。遗产保护和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矛盾。如何利用当地条件和资源来提高赤水自然遗产地居民的经济收入，丰富收入渠道和方式，缓解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对遗产地的长远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 1.2. 项目的必要性

为破解保护与发展这一矛盾，在遗产地资源保护和当地社区居民发展致富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与国际竹藤组织（INBAR）磋商了解到，赤水市拥有丰富的竹子资源。以“穷人的金子”著称，竹子广泛地应用在建筑、造纸、板材、室内外材料、手工艺品、食品保健等领域，并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与收入来源。竹子鞭根系统交错盘结可有效固土护坡、防止水土流失，快速生长广泛分布，能比其他一些亚热带树种固定更多二氧化碳，这可帮助乡村居民更好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赤水市从2001年开始借助国家退耕还林（竹）项目的实施，大力种植竹子资源。竹林面积从350平方公里增长到870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由62.2%增长到80.78%，赤水河泥沙含量也降低了62%。伴随着竹资源的发展，城乡生态环境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竹资源。



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地地图，其中橙色为遗产地核心区，绿色为缓冲区（来源：世界遗产中心）

赤水竹编培训班学员和  
部分在地执行团队 © 中国  
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  
理局



2017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竹藤组织携手，在贵州省文旅厅、赤水市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的支持下，对赤水市丹霞遗产地的保护情况以及周边社区居民生计情况进行了初步的走访调研。通过走访调研以及与各相关利益方的磋商，建议将赤水市吸纳为《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和管理》项目三期试点之一，依托于赤水当地竹资源，以赤水遗产地竹编文化手工艺品和绿色竹产品为切入口，将竹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丹霞自然遗产地保护有机结合，探讨世界自然遗产地可持续生计发展途径。2018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竹藤组织和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三方合作，正式启动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地社区可持续生计试点活动，通过探索创意竹编文化手工艺品和绿色竹产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自然遗产地保护有机结合，来促进世界遗产地当地及周边社区探索可持续的社区友好型的生计来源，以期协调和平衡遗产地资源保护和乡镇发展村民致富之间协同发展与平衡，提升当地遗产地管理能力和可持续生计发展，从而推动遗产地长远可持续发展。

### 1.3. 现状剖析

#### 1) 社区生计结构

在项目启动阶段，为了了解遗产地居民生计发展现状，项目组选定了大同镇民族村和胡市镇天堂村（图2）作为本底调研的目标村，并编制了调研问卷，对农户进行抽样入户调研，以详细了解村民生计来源、收支情况、发展意愿等。两村农户抽样率为13.6%，共计调查了231户，其中民族村152户，天堂村79户。总抽样人口827人。

在抽样人口中，劳动力占比72.6%，其中男女比例分别为55.2%和44.8%。青壮劳动力（年龄在18-45岁间）占总劳动力人口的59.7%，中壮年劳动力（年龄介于46-60岁间）占比

37.3%，老年劳动力（年龄大于 60 岁）占比 3%。从受教育情况看，79.2% 的劳动力为小学初中文化水平，仅有 1.3% 的劳动力为大学本科学历。50% 的劳动力主要在本地或外地务工，27% 的劳动力在本地务农，约 11% 在村委任职。其中天堂村初中学历劳动力和务工比例均高于民族村。

2017 年天堂村被抽样村民家庭总收入为 5.3 万多元，总支出 5000 多元，人均年净收入为 1.4 万多元，民族村家庭总收入为 3.6 万多元，总支出 2800 多元，人均年净收入 8800 元。据公开资料显示，2017 年赤水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1053 元。本次抽样数据结构基本反映出两村真实情况。

从收入结构来看，在本地或外出务工是天堂村和民族村两村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分别占到家庭总收入的 64% 和 68%。竹林收入（主要为砍伐竹子进行售卖所得）只占到 11%。

本次调研农户的农产品种植的种类主要集中表现为水稻、红薯、大豆、花生等，约半数农户养殖生猪，但因农产品基本上为自产自销（自己食用或用作饲料），畜产品也仅少量销售，总体上农业和畜牧养殖收入均普通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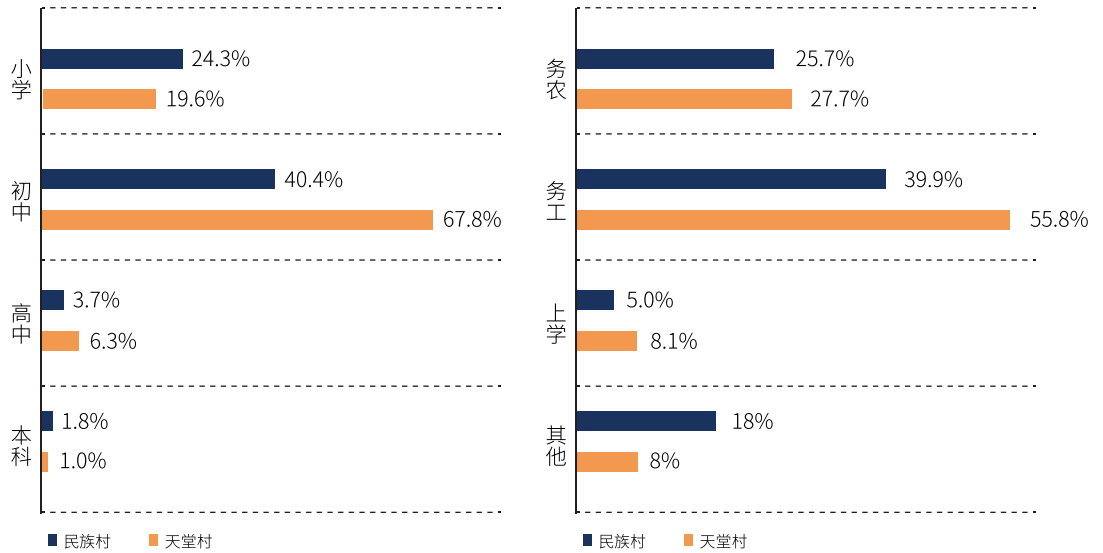


图 2-1 天堂村和民族村劳动力受教育情况与就业去向

表 2-1 天堂村和民族村村民家庭收支基本情况 (元)

	户均人口数	家庭总收入	人均年毛收入	家庭总支出	人均年净收入
天堂村	3.45	53,914.96	16,896.46	5,146.45	14,146.59
民族村	3.86	36,801.27	9,621.65	2,838.33	8,801.03

另，工资性收入在天堂村约占 18%，民族村约占 7%。这部分主要来源于在本地工厂或村委会等部门工作的收入。家庭经商对象极少，补贴、救济、福利等均有存在，但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极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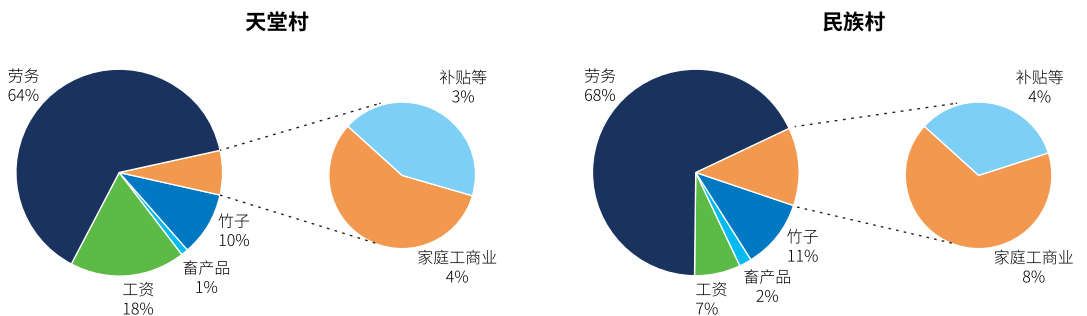


图 2-2 天堂村和民族村收入结构



赤水竹编非遗传承人杨昌芹  
作品 © 梅赛德斯 - 奔驰

## 2) 赤水竹编发展现状

用竹子做成竹篾和竹丝编制成的竹制品，统称为竹编产品。根据编制技艺不同，竹编分四个大类。（1）平面竹编，指用薄篾层编出的平面形竹编制品，约有 1000 多个品种，如各种席类、扇类、垫类、名人书画类等；（2）立体竹编，即用竹丝或竹篾编制成立体形的竹编制品，现存有 3000 多个品种，如常见的筐篮等生产生活器具、仿生竹编和有胎竹编（主要为木胎和瓷胎）等；（3）混合竹编，指把平面和立体两种竹编方式混合编入同一件竹制品，约有 500 多个品种；（4）竹编家具，即平面竹编制品嵌入竹家具中制成的竹家具，约有 50 个品种。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 12 个竹编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竹编工艺历史悠久，早期竹编产品主要为满足生活生产器皿与工具需求，如常见的筐、篮，随着社会经济和竹编技艺的成熟，后逐渐涌现出具有观赏价值的竹编工艺品。

赤水竹编产品从竹筐、竹篓等传统的竹生活生产用品，发展到平面竹编书画艺术品以及较为复杂的立体竹编装饰品，并于 2014 年被列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选料、刮青、破竹、加工、起篾、染色、煮篾、拉丝、编织、装裱等 20 多道工序，形成精美的竹编画手工艺品，价值可高达万元以上，竹丝扣瓷（瓷胎竹编），竹编包，竹藤编家具，以及市场需求旺盛的竹艺灯饰等，则为赤水立体竹编产品代表。

编织技法也在竹编的发展过程中得以传承与使用，目前主要有：十字形编织法、人字形编织法、三角形编织法、六角形编织法、立体形编织法、菊花形编织法、复合形编织法、插入式编织法、重叠式编织法、混合式编织法、无限序编织法、星点式编织法等。其中十字形编织法最为基础，广泛应用在各类竹编产品中。

## 2. 面临的挑战

通过走访调研，赤水竹编发展存有以下制约因素：

### 1) 缺乏比较规模的传承人及传承人群，带动效应尚未完全显现

调研发现，目前赤水市竹编传承人不多，在乡村的带动力和影响力有待提高。在有传承人的民族村，多数村民只能提出个别的传承人，如以平面字画和竹丝扣瓷为主的陈文兰和杨昌芹，以竹雕、竹编、面塑等多种技艺著称的卢华英；而在缺乏竹编传承人的天堂村，大多数村名很难准确说出当地竹编传承人，显示出赤水竹编传人及技艺的发展不足。

### 2) 产品守旧，创新性不足，市场缩减

赤水市竹编、竹手工艺品在 90 年代较为兴盛，随着其他产业（如土建、旅游）的兴起与工业化制品的普及，传统竹编产品（如筐、篮、篓、竹席等）尤其受到了塑料等工业产品的严重冲击，加之产品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与开发，缺乏市场竞争力，逐渐被市场淘汰或竞品取代。另外一点由于相关政策变化引起市场需求不足，以竹丝扣瓷、竹编画为代表的竹编工艺品因市场定位高，市场拓展困难，仅靠竹编越来越难以为继生计，因而很多年轻人选择了外出务工等收入更高的去向，而传统的竹编手艺人一则转营其他生计，一则手艺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

### 3) 竹编产品学艺时间长，回报周期长，制约了竹编学徒的扩充

平面竹编作为非遗传承技艺，是一个较复杂的工艺技术，对从业者的年龄、审美等要求较高。一件成品，要经过好料、刮青、破竹、加工、起篾、染色、煮篾、拉丝等 20 多道工序。在这个过程中，要把竹片处理成晶莹透明、细如头发的精细竹丝，再精心编织，最后装裱。一般初学者至少需要连续学习 3 个月，才能独立完成粗浅的作品。尽管精品竹编字画价位较高，上百元乃至上万元，但要编织出精品，一般需要磨砺 3-5 年才能精进手艺初有成效。这对学习者的耐力、精力的要求比较高。很多年轻人在这个过程中难以忍受。政府部门虽有一些竹编方面的培训，但多为留守村内的年长者参加，难以投入精编产业。

### 4) 当地竹编产业缺乏协同发展与适应能力，多种就业选择降低了竹编行业的竞争力

较之竹编技艺需要长周期学艺和投入精力，外出务工是更多青壮劳动力的选择，特别是男性

劳动力。短平快的收益能够满足村民当下谋求生计的燃眉之急。另外随着丹霞地质公园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地，赤水市旅游市场出现井喷，给当地住宿、餐饮、交通、旅游纪念品、特产等带来极大的市场。尽管不少村民认为旅游平台可为竹编带来很好的机会，但在如何开发特色竹编旅游小品、竹编文旅项目方面欠缺经验和能力。

### 3. 解决的方法

项目组根据赤水市社区特点和社会经济资源，制定了以竹编为抓手的干预策略。通过能力建设，意识提升，平台对接，培养社区竹编手艺人传承人群和带头人，并与当地企业建立联系，推动和完善当地竹编产业链，既发展了绿色产业，又传承了技艺，同时还保护了遗产地，一举多得，丰富世界遗产地当地及周边社区发展可持续生计来源。



图 2-3 项目干预路线图



### 3.1. 通过技术培训，扩充竹编人才队伍

针对赤水市竹编人才队伍总体数量不足、老龄化等问题，项目组先后组织了三次竹编技术线下培训班，根据学员竹编技能掌握情况和熟练程度，设置不同难易程度的课程，学习编织技艺。参加培训人员共计 118 名，其中 69% 为女性。此外，2020 年下半年组织了竹编技艺视频学习班，以意识提升为核心，联动社区竹编学习兴趣和热情，共计 200 多个当地社区居民观看学习。

第一期与第二期培训以竹编基础为主，以竹编人才队伍“扩容”为目标，面向初级或无竹编基础的学员，为后续物色潜在竹编带头人奠定基础。2018 年 8 月，共计 54 名乡镇居民（其中包括 36 名妇女，3 名残障人士）参加第一期竹编基础培训。通过为期 15 天的竹编技艺培训，没有任何基础的学员们看着自己亲手能编出的精美竹篮与竹灯饰等竹编产品，兴奋欣喜，兴趣盎然。通过第一期初级培训，项目选定了 20 名优秀学员。并在 2018 年 12 月举办第二期竹编培训，共计 35 名学员（其中 74% 为女性学员）参加。通过两期初级竹编培训，扩充了竹编人才，进一步强化优秀学员竹编技术，使其作为社区竹编潜在传承人，在社区播散星星之火，带动周边居民发展技艺，逐渐蕴育出竹编文化传承社区。

第三期竹编培训，以竹编人才队伍“提质”为目标，侧重于竹编传承人群技能提升，主要面向竹编（潜在）传承人、社区带头人以及初级培训班筛选出的优秀学员，在课程学习难度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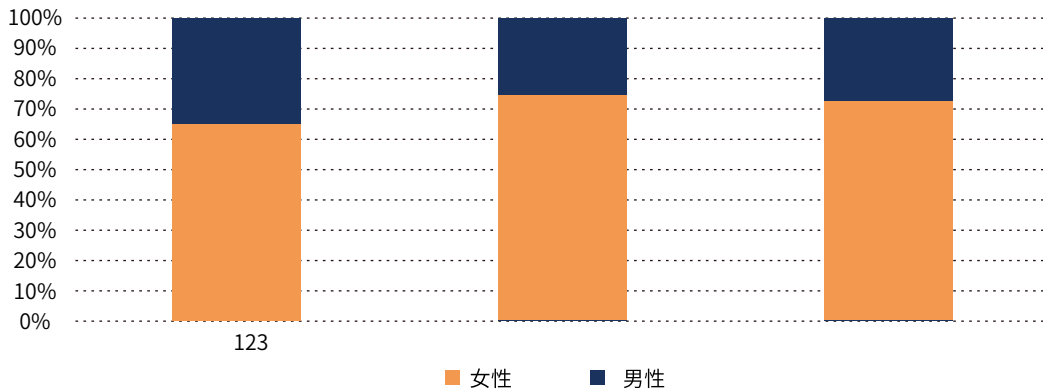


图 2-4 竹编培训人员性别组成

编织精细程度方面均有所提升，授课老师也相应地邀请到贵州省竹编非遗传承人等经验丰富的四位老师进行手把手传授，以进一步提高学员的竹编技艺和精益程度，使学员掌握较为复杂的竹编产品编织技术，培养社区竹编领军人才。2019 年 4 月，为期一个月的竹编人才提质培训在赤水市举办，29 位脱产参培的学员（女性比例 72.4%），其中 8 名为前期选拔出的优秀学员，参加此次实战学习。此次培训班也得到了贵州省林草局的高度重视，选派了 3 位来自梵净山世界遗产地的学员参培。培训内容包括竹编非遗技艺中的起篾、破蔑、拉丝、编织等核心工艺，以及 6 种立体竹编产品，包括市场需求旺盛的茶叶桶和颇受游客喜爱的竹艺灯饰等。

通过项目培训学习，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竹编人才。如学员牟小燕和唐小容创办了自己的竹编扶贫工坊，学员明星在培训后开办的自己的竹手工艺品商店，学员陈其良编织的竹灯笼销售到赤水石沓沓古街的客栈餐厅，并到临近县市传授竹编技术。

### 3.2. 加强竹编带头人能力建设与拓展

在项目平台下，针对竹编带头人发展中的能力不足和短板，先后协调、组织了六次能力拓展活动，介绍和对接相关资源，共计有 13 名社区带头人在能力拓展建设活动中收益。能力建设与拓展的主要方面包括以下三方面：

#### 1) 开拓视野，夯实平台资源对接能力

竹编带头人的视野和思路，尤其是应对现代生活和市场偏好下调整产品的能力，对竹编产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2018 年项目组织了赤水市遗产地竹编传承人和社区带头人杨昌芹及政府管理者赴北京参加国际竹藤组织主办的世界竹藤大会，交流非遗技艺传承与发展创意，开拓了遗产地传承人的眼界和思路。此外，通过项目平台，进一步推进上海美术学院和杨昌芹进行对接，2020 年杨昌芹的工作坊正式地纳入到上海美术学院非遗扶贫车间项目中。



2019 年 12 月，项目邀请竹编带头人牟小燕参加景德镇可持续生计研讨活动，与来自各个产地的代表和专家面对面交流发展思路，拓展视野。

## 2) 产品创新与设计能力

创新是竹编产品的生命力和活力核心。如何使传统的非遗竹编技艺“活”在当下，符合当代美学和功用需求，是摆在赤水市竹编传承人面前的一道难题。过去在乡村使用的传统的筐篮篾如何变成能够融入城市生活的用品用具，兼顾实用与装饰，就需要源源不断地开发新的创意产品。而创意产品的开发取决于竹编传承人、带头人的创新与设计能力。创新不仅需要灵巧的编织技艺，更需要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和捕捉市场与时尚的敏锐心灵。针对此，可持续生计项目携手奔驰心愿基金，通过 She's Mercedes - 星愿基金巾帼梦活动，举荐赤水竹编传承人杨昌芹与顶尖女性设计师开展人一对一合作，从项目概念、创意、到制作，共同开发创意竹产品。通过一对一创意竹产品开发，提高竹编传承人对美学的理解与把握，并用作品进行准确表达的能力。

此外，项目推荐了 5 名优秀竹编带头人（田雅嘉、唐小容、谢小兰、谢小霞、周孝芬）赴上海参加非遗智造 / 上海视觉艺术学员非遗研培计划，通过为期一个月的系统学习，增进了对现代审美、活态非遗、跨界材料的应用等方面的理解和认识，拓展了对产品创新的理解与实现的能力。

### 3) 加大非遗传播，提高市场推广与宣传方面的能力

针对宣传推广方面的短板，项目推荐了3名竹编带头人（牟小燕、杨广蓉、卢华英）参加了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可持续生计传播培训活动，该培训活动通过线上理论培训和一对一实战辅导，帮助学员掌握运用视频号运营推广技术、短视频拍摄剪辑等技术，培养带头人在新零售业态方面的适应和操作能力。在项目的帮扶下，牟小燕的创办了“竹西施”品牌。

此外，结合“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展系列非遗的宣传教育活动，传承文化瑰宝，守护自然之家。项目下2名社区带头人（卢华英、杨昌芹），作为竹编传承人代表，宣介竹编非遗技艺，提高了赤水竹编的公众认识和知名度。

### 3.3. 帮扶竹编带头人，提升社区影响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竹编传承人、社区带头人就是竹编产业发展的星星之火。在赤水，竹编传承人和社区带头人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因此，项目对竹编带头人的扶持，根据其发展阶段和需求，有所侧重。

#### 1) 成熟型竹编传承人、带头人影响力提升

对于较为发展较为成熟的传承人，其发展需求主要集中在缺乏编织能手队伍、产品创新和品牌影响力。如杨昌芹，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编工艺的第五代传承人，全国最年轻的90后人大代表，编织作品多以平面字画以及竹丝扣瓷为主，创办有极竹堂竹艺公司。公司现有20多个常驻工人（多为留守妇女），年营业额达到300万元，收益约20%。因此，在项目平



“巾帼梦”计划框架下国际知名建筑师胡如珊女士与赤水竹编传承人杨昌芹合作设计制作的竹编艺术品 © 梅赛德斯 - 奔驰

台下，携手 She's Mercedes - 星愿基金巾帼梦计划，通过设计师一对一创意产品开发，提升女性影响力与创造力。同时推动文旅部、美术院校等将赤水纳入到非遗扶贫项目中，为赤水提供“非遗+研培”计划下的整建制培训班、针对建档贫困户开展的“走进来”培训班、线上和线下销售平台、以及包括上海进博会、上海手造博览会等平台的宣传和传播。

再如卢华英，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贵州省高级工艺美术师，赤水市民间工艺协会会长。2012年成立了贵州赤竹神雕竹艺旅游商品开发有限公司，主营竹雕装饰、雕刻家具、旅游产品、日用品、字画等，不同花色及品种的产品达800余个，2017年实现产值300万元。其“竹雕工艺”工作室被遵义市人民政府认定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卢华英还兼任当地中等职业学校特聘老师，除了课堂教授传统手工艺，还采取公司自主培训和与政府合作等方式，先后培训竹工艺从业者、爱好者2000余人。目前，卢华英培养的本地竹工艺学员中创业的有15人，在城镇、景区开设门店20家以上；本地学员中实现就业的200余人，其中培养并实现就业的残疾人40余人，平均就业增收每月达3000元以上。今后，她计划每年培训学员100人次以上。因此，项目主要进一步加强其在竹编培训以及学员编制产品的产销对接方面的影响力，作为赤水市竹编人才队伍的孵化器。

## 2) 新兴竹编带头人影响力提升

新兴的竹编带头人，其竹编从业时间相对较短，技艺发展相对欠成熟，但具有年轻化、发展意愿强烈、接受新事物能力强的特点，是解决竹编传承“断代”问题的中坚力量。新兴竹编带头人其发展需求主要集中在稳定竹编产品品质与供应量，在社区影响力和带动能力有待发展。因此，针对新兴的竹编带头人，项目侧重于通过提供技术培训，组织交流活动，拓展视野，鼓励开展社区培训等方式，来给与帮扶，一方面提高其竹编技艺水平、新产品拓展能力、组织培训能力，另外一方面提升其在社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消纳竹编产品，特别是形成公司或工坊接单销售，社区竹编人派单生产的互助生产关系，从而形成一个正向的竹编社区协作网络，实现扩大生产产能，增强应对市场变化的韧性。



赤水竹编社区带头人唐小容（左）和牟小燕（右）带领社区居民制作竹编（图片来源：社区带头人成长纪录片）



如学员牟小燕，新兴竹编带头人，在赤水市创办了锦绣社区竹编扶贫车间，目前共有工人 30 名，其中，女性有 25 名，男性有 5 名，车间间接受益人有 50 人，其中女性 40 人，男性 10 人。竹编扶贫车间每天生产竹编工艺品约有 60 件，每月毛收入有 8 万元左右。唐小容，大同镇竹编手工艺产业的带头人。2016 年创办了竹艺兰坊竹编工坊，以生产竹编灯笼为主。目前工坊为留守妇女提供就业岗位，还在社区开展多期竹编培训，特别是异地搬迁贫困户，帮助解决就业和生计。

#### 4. 经验和思考

通过分析总结项目干预手段的有效性，提出以下几点主要经验，以期为同类型项目发展提供经验参考，特别是为自然遗产地管理保护以及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协同发展提供借鉴。

##### 1) 赋能育人，通过能力建设，创设竹编传承社区

非遗技艺的传承核心在于传承人的发展。留得住人才，能够吸纳新的血液和力量，对于非遗传承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一方面，要在加强社区能力建设基础上，项目也着重建立企业 - 带头人 - 社区的产业链传动模式。通过带头人的活力和影响力（如工作坊、体验馆），一方面带动社区更多人学习手艺，能够编织出合格的产品，另一方面通过带头人与企业建立供销合作，组织产品销售等，从而形成一条完善的产业链，提高效率与收益。项目亦有意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特别是妇女，从而有助于解决留守儿童和老人的社会问题。通过多方协作，从而真正地使遗产地从业者实现居在绿色资源，富在绿色资源，守在绿色资源，护在绿色资源，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伟大使命。



图 2-5 竹编产业链传动模式

另一方面，要注重传承人才队伍梯度建立。在竹编技艺传承上，形成分年龄和分技术难易程度的各级传承人群，形成人才队伍的双梯队，即老中青梯队和技艺梯队。这样既有利于技艺的代际间传承，又保持在适应性方面的创新能力。技艺水平可从简到难逐渐提升。通过学习较为简单的竹编技艺，建立学习的信心与兴趣，夯实技艺，成为一般竹编手艺人。而后再随着技艺的不断练习与成熟，过渡到较难的技术学习，成长为竹编工艺师，最终达到自己自由创作的阶段，成为大师。

## 2) 协同在地资源，共谋融合发展

赤水市因丹霞世界自然遗产、红军革命教育文化、竹资源等，其旅游业较为发达，衍生出上下游各类配套产业与服务需求。如何协同当地在地文旅产业，开发适合于当地社区的创意文化手工艺品与绿色生态产品，利用文旅平台进行售卖，有助于提高社区收入。竹编产品结合旅游业发展一批旅游类产品。可包括针对客栈酒店的竹编灯笼，竹编工艺品等，增加旅游文化体验感，针对游客的特色旅游伴手礼，如简单的竹编茶盒、竹编香囊、竹编挂件等简约大方的伴手礼等。

## 3) 加强竹编技艺的宣传

一是通过宣传让当地人对现代竹编有新认知，加强和培养竹编传承人群兴趣。二是加强竹编传承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可共同合作开发产品。三是要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和交流。比如积极参加全国各地的展览，与世界各地的竹艺行业保持密切的关系。

基于项目经验和当地发展现实，后续工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 1) 继续赋能竹匠工作坊 / 合作社，扶持竹编传承人的可持续成长

针对合作社 / 工作坊发展方面的不足，给与针对性的帮扶。比如开展工坊、合作社的组织化发展及规划方面的培训，现代化生产管理、法务、营销、电商、业务拓展等方面的培训，推进竹艺产品生产质量和产能；组织工作坊优秀代表参加相关行业展会 / 考察活动以及在线销售平台，推进工坊销售能力；推动赤水竹艺协会的发展，建立赤水市级竹艺从业人员数据库，引导传承人可持续发展，推动行业协会年会制度建设，引领相关项目和行业发展，对接社会 / 市场资源，发挥信息中枢作用；推动市级竹艺工艺师评选与认证，鼓励竹编传承人、带头人开展社区培训，增强影响力和知名度。

### 2) 吸纳不同行业领域之长，设计与开发创意竹产品

产品的创新，应考虑与不同的行业和领域的融合。比如引进或与设计师团队合作，或者用各种方式引进人才，或者以优良的平台招商引资，提高当地手艺人的审美能力与产品开发能力。一方面借助人才资源，以赤水当地的资源优势开发各类旅游纪念品和与当代城市风茂相宜的工艺品与艺术衍生品，同时可以保持与外界的联系交流，积极组织政府官员与优秀学员去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地的竹艺典范参观学习，开拓眼界，从而达到国际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此外还可以其他材料进行融合创新，比如竹编与刺绣相结合，创作的一些精美挂饰、手镯、提包等。

具体来说，可组织竹艺创意设计竞赛，选拔具有市场潜力的产品，比如组织赤水市级竹产品创意设计比赛，甄选出具有市场潜力的产品；还可组织优秀代表及其作品参加全国性竹产品

设计竞赛：如竹天下、竹具设计赛，竹文化节等。通过不断地走出去和请进来，吸纳新的创意与理念，不断创作出接地气的有设计感的产品来。

### 3) 建立高校与合作社人才流动与互助培养机制，促进人才融合发展

在短期上，通过进修学校或与高校合作，按年龄或教育程度来划分，针对性地培养对象，可帮助本地培养人才。但从长远来看，要开办针对性的中专或大专学校，培养本地的设计师、技师，这样能源源不断地培养出能够根据市场变化趋势来开发和迭代相关产品的竹编人才，将产业延续和发展下去。

形成高校-工坊协作机制，建立实习基地，促进高校与合作社人才流动与互助培养。如组织职高、高校学生参与竹艺活动 / 沙龙，或者开展夏令营、冬令营活动，一方面青年学生在竹编工坊学习基础竹艺知识，实践竹编技艺，另一方面，工坊传承人也能吸纳年轻人的审美和消费新趋势，并融入到新产品的开发中。此外也可以通过鼓励青年学生创作“我与竹编”文字或视频故事，在社交媒体进行分享与宣传，把竹编纳入到公众时尚趋势与认识中。

### 4) 长效短效精准培训

短期培训，单次培训时间长度约 1-3 个月，多适用于学员入门。可以分两个部分：一、竹编前期材料准备的培训，主要培训破蔑、刮青、抽丝，变成竹蔑的技能；二、简单有成效的竹编产品的编织技艺学习。培训对象也可以区分，年龄在 25-45 岁之间的。培训结束后，可扶持这些售卖渠道，与当地一些店铺或工作坊建立长期合作，有利于培训后可流水线的生产加工，解决其生计。

长期培训，多适用于进一步加强传承人与设计师进行竹编产品的开发，在前期竹编学习基础上进行较为复杂的编织和开发。产品开发应遵循“以点到面”的思路，从竹艺的一个单一的小点逐步发展成为竹艺的各种表现形式，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成熟的竹艺产业链。



梵净山 © 铜仁市申遗领导  
小组办公室

## 案例三：多种非遗融合创新 助力减贫和性别平等 ——贵州梵净山松桃苗绣试点

### 1. 试点背景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地理位置处于东经 108°至 109°，北纬 27°至 28°间，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松桃地形地貌复杂，全县可分“东部丘陵状中低山区、中部丘陵河谷区、北部低山沟谷区、南部低山沟谷区、西部中山峡谷区”等五个区域。

位于松桃西南部的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因符合“是生物多样性原址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在科学和保护层面上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这一标准，于 2018 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产地核心区面积 402.75 平方公里，缓冲区面积 372.39 平方公里。梵净山保存有完好的生态植被，其中包括 7000 万至 200 万年前的古老珍稀孑遗物种，以梵净山冷杉 (*Abies fanjingshanensis*) 为代表。据调查，区内有野生动物 1004 种。其中兽类 69 种、鸟类 191 种另 4 亚种，两栖爬行类 75 种，鱼类 48 种，陆栖寡毛类 21 种，昆虫 600 种，以黔金丝猴 (*Rhinopithecus brelichi*) 为代表。2019 年《国家地理》杂志发布全球最佳旅行地，梵净山成为国内唯一上榜旅游地。独具优势的生态资源、瑰丽不俗的自然风光，加上历史悠



久的佛教遗迹、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使得梵净山旅游人数呈井喷式发展。2019年，梵净山共接待游客143.56万人次。

在发展生态旅游业的背景下，梵净山如何兼顾旅游经济和环境保护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遗产地的旅游发展不能一味满足大众旅游市场的需求，无序地建设服务设施、引进泛滥的旅游商品；而应该充分考虑遗产地的原真性，在保存、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发掘当地文化的经济价值。在这一方面，松桃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历史上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此地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苗族聚居地，目前松桃苗族自治县内苗族人口共占总人口的68.11%。截至2021年，松桃县拥有松桃巴狄雄萨滚、松桃苗绣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松桃瓦窑四面花鼓、寨英滚龙、侗技—上刀山、苗族二月二、茶灯、苗族武术、苗族婚嫁礼辞、苗族“接龙”习俗、苗族“八大碗”习俗、苗族银饰锻造技艺、挑痧疗法等多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苗族是古老的民族，也是一个迁徙的民族。尧、舜、禹时期，华夏族称苗族先民为“三苗”“有苗”或“苗民”。三苗战败南迁后，较先进的一支在其故地上建立楚国。秦朝统一天下后，苗族多迁徙至武陵五溪一带，后又继续南迁。苗族迁入贵州最早是在战国时期。西汉桓宽《盐铁论·论功》言“今西南诸夷，楚庄之后。”松桃苗族的起源难以考证，但在明朝以前松桃便是苗族聚居地，距今六百余年。

不断的战争与迁徙，没有打散苗族的生命力，反而产生了强大的内聚力，形成了独特的苗族文化。苗族没有文字，只有语言。他们以图画、图案代替文字成为记录其历史文化的载体，苗绣、蜡染、银饰等则是他们的记录方式。其中苗绣被称为“无字的史书”，是追溯其历史、信仰、文化的重要依据。

松桃苗绣于2015年列入贵州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1年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松桃苗绣取材广泛、配色大胆、针法多样，具有“鲜亮明快、原始古朴”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其文化内涵所体现出的本民族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和民俗活动。苗绣之所以能记录苗族的历史文化，是因为苗绣图案是苗族演绎天地万物、记录生活和历史的载体。其创作题材皆来源于苗族人的所见所闻所思，可大致分为自然类和历史类。

## • 自然类

松桃苗绣取材自然，以花鸟虫鱼为创作素材，加以浪漫夸张的想象，突出其特征以达到美化的效果。常见的自然类题材有蝴蝶、牡丹、枫叶、孔雀、石榴、鱼、喜鹊等，在自然事物上加以神化的题材主要有龙、凤。

以蝴蝶妈妈为灵感的松桃苗绣



以凤鸟、牡丹、蝴蝶为题材的松桃苗绣



将梵净山鸽子花和苗族传统图案结合起来的松桃苗绣



苗绣对这些物象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赋予了它们吉祥的寓意和虔诚的信仰。苗族信仰“万物有灵”，其歌谣《苗族古歌》唱道“每座山峰都藏着无尽的宝藏，每棵绿树都香睡着美丽的精灵”。所有事物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自然界的种种事物都与人的健康、命运联系起来。比如，“鸟啄石榴”让人联想到繁殖生育，小孩衣帽上的“五毒”（蜈蚣、蜂子、壁虎、蛇、蟾蛛）可以消灾避邪，盛开的花卉象征少女与爱情。

此外，自然事物被神化，成为苗族的图腾信仰。关于苗族起源的传说在黔东南流传：枫树干和枫树心生出了蝴蝶妈妈，枫树梢变成姬宇鸟。蝴蝶和水里的泡沫恋爱生下十二个蛋，她请姬宇鸟帮忙孵蛋，最后一个孩子就是苗族的祖先姜央。我们可以在相当多的苗绣作品中看到枫叶和蝴蝶的形象，是苗族生殖崇拜和图腾崇拜的生动演绎。还有部分氏族以（凤）鸟为图腾，松桃龙姓就是其中一员。他们以鸟为姓氏，称自己为“代半”“代努”，“半”就是鸟的意思。因此，在松桃苗绣中最常见的便是蝴蝶和凤鸟图案。

### • 生活历史类

苗族人不仅绣出自然万物，还绣出了自己民族的历史与生活。这一类图案大多具有高度概括的抽象性，化繁为简，用简单而寓意丰富的图案描绘苗族人的历史。

以松桃苗绣盛行的“弥埋”和“浪务”图案为例。“弥埋”图案由无数个似马的图案组成，横跨在河水中；两边以花塔表示崇山峻岭，相间排列；外层以一折线形图案镶嵌，意为“大地上的脚印”。整个纹样表现了苗族祖先骑马跨越千山万水，定居松桃的情形。“浪务”是两条中间有星星点点的折线形白色横带，象征长江黄河；横带两边分别是小山和花簇；再外边是两条直线和一排小树。整个图案表示苗族先祖曾经在长江黄河边居住，那里森林繁盛、水草丰茂，是对祖先美好生活的追忆和敬仰。

苗绣的图案同样可以使用蜡染和银饰演绎。过去，松桃苗族人将蜡染和苗绣结合制作苗衣；现在，松桃人将蜡染和苗绣结合制作抱枕、工艺包、桌布、丝巾等工艺品，将苗绣、蜡染和银饰结合制作耳环、项链、手镯等饰品。苗绣图案也有了新发展，松桃苗族也用刺绣记录身边万事万物。梵净山的雪景、珙桐（俗称鸽子花）、黔金丝猴等均在松桃苗绣中出镜，珙桐还成为松桃苗绣的标志。

苗绣的图案同样可以使用蜡染和银饰演绎。过去，松桃苗族人将蜡染和苗绣结合制作苗衣；现在，松桃人将蜡染和苗绣结合制作抱枕、工艺包、桌布、丝巾等工艺品，将苗绣、蜡染和银饰结合制作耳环、项链、手镯等饰品。苗绣图案也有了新发展，松桃苗族也用刺绣记录身边万事万物。梵净山的雪景、珙桐（俗称鸽子花）、黔金丝猴等均在松桃苗绣中出镜，珙桐还成为松桃苗绣的标志。

松桃苗绣工艺涉及工具材料较简单，以绣地（布）、绣针、绣线为主，辅以剪纸、画笔、绣棚、针顶等。松桃苗绣仍坚持使用无污染无公害的材料，但纯手工耗时长，人工成本昂贵，难以进行产业化，因此“人工+机械”的半手工产品成为广受好评的新品种。目前，松桃一边生产价格较为低廉的半手工苗绣产品，一边生产高端的纯手工苗绣工艺品，以满足时长的不同需求。松桃苗绣产业从业人数达 3800 余人，年产值达 6800 万元。目前在县城经营苗绣产业的个体户 18 家，每家 2 至 3 个工人，生产到销售一体，主营苗绣花片、和苗绣衣服鞋帽及配饰等。在苗族聚居的乡镇，每个乡镇有 1 至 2 家苗绣家庭作坊。其中以石丽萍创立的松桃梵净山苗族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规模最大。

## 2. 面临的挑战

### 1) 苗绣传承人不足

松桃苗绣作为重要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其得以长久传承的关键所在。一方面，我们现在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称为“非物质”，但与“物”密不可分。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不在于“物”与“非物”，而在于文化的“传承”，其核心是传承文化的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与传承离不开传承人。也就是说，传承人消失，原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不复存在。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是传承人。目前，松桃县苗绣企业的工作人员大都是本县及周边乡镇的人。其特点是文化水平较低，大专文化寥寥无几，基本上是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松桃苗绣企业的发展，不利于发挥人才发展战略在企业竞争中的主导作用。因此，实施人才引进战略，吸收、引进高端人才是发展松桃苗绣的重要工作。

人才的缺失表现在：一方面，本地人才流失严重。随着城市化的进行，松桃县（受教育、普通手工业、居民）外出务工、求学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留在城市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另一方面，外地高端人才不愿进来。即便愿意付出较高额的薪资报酬，外地受过高等教育或是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考虑到松桃县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生活配套服务不够完善，发展空间“可能”较小，对他们来说，去松桃县工作生活，显然也不是令人“感到满意”的理智之选。

## 2) 机绣的冲击

由于机绣可以批量生产且较为便宜，尤其是低档绣品的价格只有手绣的几分之一，利润却比手绣多几倍甚至十几倍，中档以上的绣品只能由手工绣制而成，耗时耗力以及刺绣人老龄化等诸多原因，苗族妇女们都选择快速便捷的机绣来完成苗绣作品，尤其是苗绣坊的苗绣商品。如今旅游区或商店卖的苗绣商品基本上都是机绣的，机绣效应的广泛侵袭，使得许多机绣无法完成的复杂绣法逐渐面临失传，再加上传承人不断老龄化的趋势，导致越来越少的新传承人能掌握苗绣高超的刺绣技法，苗绣技艺面临丢失的困境。在宏观层面，由于机器程序的设定，也由于一般市场的需求，特定的支系的具有丰富图案、意义，常常被流行的通俗的机制图案代替，这使得特定支系的文化同质化，进而慢慢消失。大量复制的图案或服饰，回应的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导致传统艺术“光韵”不可避免地消失。手绣图案取材广泛，且绣工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几乎可以仿绣任何题材的图案。且机绣相对于手绣，针法少，在绣线粗细的选择上极其有限，机绣品整体用色鲜艳明亮，光泽度强，设色较少，过渡效果略显不自然，而手绣品的色彩选择要丰富得多，中间色的层次过渡较多，画面刻画细腻，效果逼真，气韵流畅。在触觉感受上也不尽相同，机绣多使用化纤料制成的丝光线，机绣品具有紧绷感，不断线导致机绣品比手绣绣片沉。

## 3) 面向市场准备不足

根据松桃县政府工作人员和苗绣企业管理者的工作实践，可以看出松桃苗族刺绣产品现在面临的困境一方面缺乏外部市场经济的刺激，没能形成固定的产业链。另一方面，松桃苗绣产品的市场价值和地位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形成“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境遇。此种局面的形成，无外乎以下三种原因。

第一，松桃苗绣生产成本相对较高。所需用料是上等丝线，成本较高。另外，是纯手工绣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在价格方面，手绣材料及人工成本都相对较高，其优势只有在中档以上的绣品中才能得以很好地体现。

第二，松桃苗绣产品宣传力度不足。政府部门和相关苗绣企业对于苗绣产品的文化价值宣传

不到位，因此文化价值未深入人心，品牌价值没有得到凸显，文化属性也无法变现，而文化价值正是松桃苗绣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多数非遗文化产品的观赏性强于实用性，创新型产品较为缺乏，营销观念多局限于传统媒体，甚至有些企业认为“好酒不怕巷子深”，不需要媒体的推介，不善于利用全媒体进行产品的推广。

第三，松桃苗绣产品适用范围缩小。对市场调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市场需求不能够做全面周到的分析，缺乏全产业链思维，松桃苗绣多限于工艺品和部分日用品，而不主动与工业企业联合，借助地方性工艺知识改进产品的设计和制作。现在的苗绣产品实用功能减弱，很少有人将其穿在身上、拿在手里，大都做成创意工艺品、披肩、茶席等高端礼品进行馈赠。此外，松桃苗绣产品的销售大都是在本县城及周边乡镇，主要卖给本民族的人使用，或者来松桃赶场的外乡人，他们大都买来进行装饰或美化家居。

### 3. 解决的方法和采取的行动

#### 1) 完善传统手工艺保护与传承政策

为了使松桃遗产地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更好的保护与传承，首先应当完善传统手工艺保护与传承政策，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各级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和传承的领导责任，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经费纳入松桃县地方财政预算，加大对研究项目的经费保障力度。投入资金加强对松桃非遗项目保护和传承基地建设，特别是对濒危的项目加强抢救性保护，对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录音录像和出版。有关部门应抓紧做好现有传统手工艺的征集收藏工作，例如苗绣图样、苗绣精品、苗绣绣法针法等，用文字、声音、影像等方式将其工艺流程和相关技术环节真实地记录下来，为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和未来的民族文化的研究保存一份珍贵的文化档案。

松桃苗绣苗银蜡染等传统手工艺依托于松桃人本身而存在，是“活态”文化及其传统中较为脆弱的部分。目前在省、市级层面上已建立了相对详实的传承人资料，但县区级的传承人资料还不够完备。因此，要尽快进行全市范围内的非遗传承人的普查工作，建立非遗传承人数据库，实时记录传承人的基本情况和掌握相关技艺的情况，及时搜集他们的作品。例如松桃苗绣培训班及时搜集传承人基本信息，了解其访谈等方式掌握其从事的非遗项目、从业经历以及优秀作品等，形成传承人档案。

同时，对传承人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监督机制，对传承人每年的传承、授徒、活动情况及时、准确掌握。为了提高传承人的积极性，更好地鼓励传承人多进行传承活动，可建立专项基金进行支持与奖励。在相关实物、资料的搜集、收徒传艺、博物馆对外展示、公益性宣传等方

面开展工作，为松桃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传承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保护的同时，也要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文化和遗产，不仅需要通过行政、法律、教育等手段，更需要通过创新的方法，发挥遗产的活力和韧性，不仅需要保证遗产本体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承担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任务。这一理念正是 UNESCO 世界遗产地可持续生计活动倡导的。2019 年 UNESCO 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携手开启了非遗可持续发展的合作，选择贵州梵净山世界遗产区域内的松桃为新试点，以遗产地特有的非遗代表性手工艺即苗绣苗银蜡染等为切入点，以文化经济为导向，通过协同自然和文化、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世界遗产地社区居民提供或优化可持续的生计方式。

<b>与文旅部非遗司深度合作联合选点</b>		<b>基线数据调研覆盖1项国家级及2项省级非遗</b>
		
<b>1</b> 期非遗研培班		<b>15</b> 名女性松桃苗族非遗传承人、从业人员、易地搬迁户、职高学生参培

未来 UNESCO 将继续与文旅部非遗司携手，持续推动建立健全相关组织机构、传统手工艺保护与传承政策措施制定和落实。

## 2) 加强非遗传承人队伍建设

松桃苗绣等非遗传统手工艺的传承要有整体文化观，这些传统手工艺是苗族人民身处其中，并以自己的日常生活来体验、实践和传承发展的文化传统，是由主体、载体和实践构成的文化现象整体，而单个的工具、产品乃至技艺可能是某种文化传统的要素，但不是非遗的整体。因此在这样的非遗观下，没有传承人，就没有传统手工艺，保护非遗的工作实际就是保护传承人，传承传统手工艺就一定要加强传承人队伍建设。

加强非遗传承人队伍建设，首先要做非遗传承人的“传、帮、带”工作，通过开设相关的培训课程、研修班学习或者一对一的辅导，逐步培养一支基础扎实、技艺精湛的传承人。因此，2020 年 10 月 15-29 日，UNESCO 项目下在苏州举办了一期“贵州松桃传统工艺研修班”，其主题涵

盖苗族非遗技艺传承以及多种非遗元素融合创新等。此次培训得到了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苏工美）的大力支持。苏工美作为全国首批非遗研培院校，至今共举办 30 余期非遗传承人及非遗管理干部的研培项目，并在非遗传承发展、审美设计水平提升和品牌建设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



中国梵净山世界遗产地松桃苗绣传统工艺研修班 © 陈凯丽

项目下选派了 15 名女性松桃苗族非遗传承人和相关专业人员前往苏州参加此次培训，其中包括移民搬迁点贫困户 8 人、苗绣经商个体户代表 5 人、职校苗绣职业教师 2 人。培训班结合中央政策法规学习、小班现场教学、业务实践、设计考察观摩和工作交流等多种方式，旨在提高传承人相关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培养传承人的学习能力和领悟能力，提高传承人审美水平，提升其生产创作水平，总结提炼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工作经验与模式，增强工坊工艺品的艺术性和实用性，对接市场需求，提高产品附加值，在带动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的同时激发贫困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意识。此次培训班全方位的提升参训学员的能力，并初步筛选出 4 名非遗扶贫社区带头人，为项目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人才储备。

其次，要积极做好传承人培训，推动非遗进校园，提高传承人质量。非遗传承面临的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就是传承人老龄化，面临着传承断代的问题。为了缓解这一问题，培养更多年轻的苗绣人才，松桃县联合企业、学校、社区大力开展传承人传习工作，聘请了一批民族文化人才在县民族中学、县职中等 10 多所民族学校担任民族文化传习教师，推行苗绣进校园

的活动，将苗族刺绣技艺与文化引入校园，把苗绣纳入松桃苗族自治县中等职业学校服装专业和幼师专业的特色课程（必修课程）。如今，松桃苗族自治县中等职业学校已经成为省级示范职校。多年来，这个专业已经培养了数千名掌握苗族刺绣技艺的学生，师生们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根据苗族刺绣的针法特点，将现代文化的元素融入传统的松桃苗绣当中，研发成许多刺绣系列产品，已逐步走进市场，受到广大消费者的赞赏，为松桃苗绣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生血液，让苗族刺绣传统技艺成为“活态”得以保护和传承。

此外，要求每个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每年开展培训工作两次以上，承担起自身传承与传播苗绣技艺的责任。同时，苗绣被纳入县就业局职业技能培训课程，易地扶贫搬迁的居民可以选择通过学习苗绣来实现就业，既能够解决当地因为易地搬迁带来的农村就业问题，又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从事苗绣，为苗绣储备大量的后备力量。

### 3) 培养非遗扶贫带头人，践行帮带之法，带动农村妇女就业

松桃地区人们的教育水平与生活观念相差较大，为了更好地实现脱贫致富，选取当地教育程度较高、观念较为先进开放、苗绣技艺高超的传承人作为带头人进行培养，再通过带头人在其岗位与领域内影响更多人，对其他人进行帮扶，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在这些传承人带头人中突出的有石丽平。石丽平带领团队紧紧围绕“一条龙服务”机制——设备采购一条龙服务、技艺培训一条龙服务、产品销售一条龙服务来助推脱贫攻坚工作；并且与松桃县九江乡地安村结成帮扶对子，以手工产业带动扶贫，培训当地农村妇女刺绣、编织等手工技艺，并且给她们订单，让其制作，为家里带来收入。



松桃苗绣省级非遗传承人石丽平（右）指导当地绣娘 © 石丽平





在安置点妇女之家制作刺绣的苗族妇女 © 张悠悠

为了让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妇女们能够有一技之长，由县妇联牵头扶持和建设，田茂媛在县团山安置点工青妇脱贫示范基地成立了“贵州松桃苗林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即“锦绣坊”。“锦绣坊”是一个集绣娘培训、产品加工、销售为一体的楼下巧工示范点，是县内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首个安置点扶贫工坊，通过这种帮扶制度，发挥带动致富的辐射效应。

#### 4) 鼓励融合创新发展，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特色产业共同体

松桃苗绣等传统手工艺自发源地就植根于特定的地域文化，反映了松桃地区的政治、历史文化与经济的演进。在传承与保护的过程中，传统手工艺为顺应时代潮流不可避免的需要创新，但应根据项目特色考虑如何融合创新。融合可以是将不同的松桃传统手工艺融合到同一件作品之中，也可以是将传统的手工艺与现代审美相融合，从而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创新可以传统带来新的活力，非遗传承人在创新中应该注意不能擅自改变非遗原有的文化，合理开发传统手工艺产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将传统手工艺进行原生态传承创新化传承。

松桃苗绣具有独特的苗文化特色，悠久的历史在刺绣中独树一帜，如何将独特的苗文化推广出去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松桃苗绣等传统手工艺应当借鉴黔东南的先进经验，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实用艺术品相融合，既可以传承和保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又符合现代人审美的心理需求，这正是传承和创新传统手工艺的另一条新路径。

同时也可以与其它非遗项目进行融合。苗绣不是一个单独存在，需要通过其他载体呈现，并



且苗绣与松桃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应用非常广泛，因此，苗族服饰、蜡染、土布、银饰、苗族医药等非遗都是与之相关的。例如苗银与苗绣融合创造出更多具有苗族特色的手镯、项链等手工艺品甚至是公文包、挎包这类现代实用艺术品，苗绣蜡染与苗医融合，创造出颈枕、香囊等特色作品。唯有传统手工艺真正具有自身的造血功能，让更多的人能够亲近它、使用它、购买它，它才能从日渐濒危的困境中走出来。

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在图案、纹样、配色等方面进行融合创新，例如苗绣蜡染等传统手工艺产品创新样式，延伸到了现代生活用品之中，比如沙发垫、桌布、钱包、手机包、电脑包等。然而一些传统手工艺产品本身已经具有很好的商业化优势，应当顺应传统手工艺传承规律推动其自身的发展，而不能为迎合市场口味，过渡开发，放弃自身的“灵魂”。传承者在研究开发时，应该明白自己产品所传递的精神是什么，如何才能保证血统的纯正，在融合入新的“血液”后，产品的生存得到了帮助，且产品本性还是原来的“配方”。在传承人方面，不仅要考虑年龄和意愿，传承人本身的文化素养也影响着传统手工艺的发展，鼓励传承人在原生态的传承下，不离开其本身所传达的文化进行开发。

为了使得松桃苗绣在市场上更具特色、更具竞争力，也为了使得其他非遗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松桃当地的非遗传承人联合起来，互相学习，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之上进行创新，打造属于松桃的别具吸引力的可持续发展的特色产业共同体。目前，松桃鸽子花已经建立起土布、蜡染、苗族刺绣、苗族服饰制作的产业链，将这几种非遗技术贯穿起来，抱团发展，形成产业化发展的基础。

### 5) 多渠道传播松桃“苗味”，提高松桃苗绣知名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结文化、自然和人类社会的重要纽带，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物质和非物质、自然和文化的融合能更好的发挥文化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上的潜力。苗绣来源于苗寨，苗寨承载着苗绣。苗寨与苗绣相辅相成、互相支持，穿越千年。从苗寨发展的角度探索苗绣的未来，积极发展文旅事业，文化和旅游的融合，能够帮助文化和旅游达到双赢的目的，文化能够提升旅游的品味，旅游能够促进文化的发展，黔东南西江千户苗寨便是如此。与旅游业蒸蒸日上的黔东南相比，松桃的“苗味”似乎并没有传播出去，旅游市场的营销策略是松桃传统手工艺品形象传播的关键渠道。依托梵净山这一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独特地理优势，紧紧抓住松桃苗文化旅游日益兴旺的契机，依托文物、风景区旅游景点，不断创新非遗产品观赏性和娱乐性，丰富旅游文化内涵，推进非遗与旅游相融合

苗银苗绣蜡染创造出的工艺品因其手工制作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难以进行大规模生产，因此在保持苗韵的同时，可将高质量、高品质的苗银苗绣与苗族传统节庆和各种活动相融合，借力大众媒体的宣传报道，迅速提升松桃手工艺品的知晓度、知名度和美誉度。在这方面，松桃县委、县政府积极帮助苗绣公司争取和拓展宣传渠道。一是组织、举办活动提升知名度，通过参加国内知名博览会和展销会，举办苗族服饰展览、银饰展、刺绣展、苗族刺绣大赛等活动，提升松桃苗绣的知名度。近10年来，松桃苗绣共参加各类展示活动200多次，其中大型和高端展示活动60多次。2014年赴米兰、拉斯维加斯、印度尼西亚等地参展，2015年赴迪拜参展，2016年赴香港、澳大利亚参展。2020年由于疫情影响，很多集体活动都被取消了，原定的苏州创博会、麻料村乡村论坛、浙江文化与自然遗产日活动以及中德文化交流活动都无法参加，但是各个传承人充分利用新媒体，通过直播带货以及微信、抖音、淘宝等等平台对松桃苗绣进行宣传，尤其是非遗购物节的时候，鸽子花的香囊、胸针等产品受到热捧。

二是建立活态窗口提升知名度。苗绣公司在松桃、铜仁、重庆秀山、贵阳等地设立活态展示窗口，成为了与国内外客户交流苗族文化及非遗文化的重要平台，有效提升了松桃苗绣国际国内的知名度。

此外，为了让苗绣得到更好的传承与保护，仅仅依靠“口传心授”是不够的，应当用文字将其记录下来，并且进一步加大学术研究力度，出版了《苗绣松桃》等相关书籍，考证了松桃苗族的迁徙历史与文化的定居，记录了松桃苗绣的针法、绣法、图案以及其他内容，让松桃苗族的历史与文化得以更好的保存，书籍的出版也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松桃苗族与松桃苗绣，吸引更多的人来研究松桃文化，从而实现松桃文化的传播。

#### 4. 反思：现代化与传统的均衡

随着现代化与商业化的发展，松桃地区的非遗发展似乎陷入了现代与传统的悖论之中。

一方面，与黔东南地区相比，松桃地区非遗保护开始较晚，仍然处于保护的初始阶段，传承人的质量、传承基地的建设、文创产品的设计、文化的宣传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不足。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工业的冲击，目前，松桃地区苗绣、银饰等非遗的应用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外来游客会购买这些非遗产品，反而当地人的日常使用率降低，只有结婚和重大节日的时候，这些传统才会重现。使用才是最好的传承，因此，让当地人使用松桃苗绣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所以，在当地选取文旅融合发展的打造基点的时候，应当将这个问题纳入考虑范围，选点不仅要有足够的手工艺的基础、产业基础、旅游资源，能够消化生产订单，而且在进行基点打造的时候，还需要尊重当地的生活环境，与当地的社会环境相结合，在此基础上进行生产能力的考量。发展应当是可持续的，不应当是打破的、断代的、不均衡的，应当在带领松桃地区人民脱贫致富的同时，在现代化中恢复传统，实现当地现代化与传统的均衡，保证非遗的可持续生态发展。



2020年10月研修班期间松桃苗族绣娘在苏州中国刺绣艺术馆参观学习 ©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宝兴县  
硃碛藏族乡

## 2.4. 改善自然环境并使之更加可持续

### 案例四：依托遗产资源开展高山养蜂和自然教育，促进世界遗产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区发展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遗产地雅安和卧龙养蜂可持续生计活动

#### 1. 试点背景

位于长江上游地区的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地（简称大熊猫遗产地）地处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是世界瞩目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和全球最大最完整的大熊猫栖息地，包括卧龙、四姑娘山和夹金山脉等区域内七个自然保护区及数个森林公园等其他保护地，地跨成都市、雅安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四个地级行政区，面积 924,500 平方公里，生活着全世界 30% 以上的濒危野生大熊猫。这一地区同时也是世界上地震、塌方和滑坡风险最高的区域之一，其核心区和缓冲区中仍生活着数以万计的汉、羌、藏等，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收入来源比较单一，例如常年的过度放牧已经导致遗产地高山生态系统的严重退化。2008 年以来，大熊猫遗产地先后经历了两次特大地震。2008 年 5.12 汶川大地震造成了雅安片区 4906 平方公里栖息地，22 个自然村和外围保护区范围的 18 个乡镇受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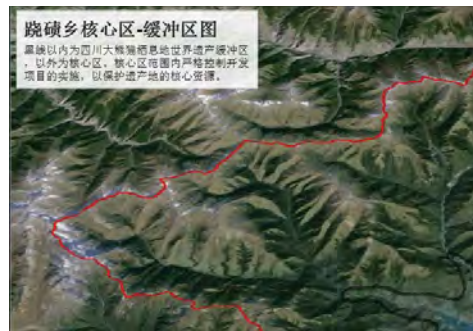
地震引起的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造成 6 个遗产地单元 30% 到 50 % 的管理设施损毁，17 个保护站、202 公里监测道路损毁。2013 年 4.20 芦山地震让尚处恢复期的遗产地环境愈加脆弱，芦山、宝兴、天全县遗产地及外围保护区原住居民房屋 100% 受损，管理用房和服务设施、保护监测设施、设备基本全部遭到破坏。如何能同时满足社区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需求对维持遗产地的完整性是个巨大的挑战。

2015 年开始，建立在对遗产地高海拔区域的宝兴县跷碛乡详尽和严谨的社会及生态调查的基础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框架下，雅安市遗产管理办公室和汶川县熊猫乡土绿色发展中心（简称熊猫乡）共同设计和实施了以中华蜜蜂养殖为核心的大熊猫遗产地社区可持续生计试点活动。试点活动所在的嘉绒藏族社区地处遗产地核心区，蜜蜂养殖对维持自然遗产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有重要的正面作用，非常符合探索保护和发展并行的遗产地保护新理念的实施。遗产地还是世界上除热带雨林以外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生长着属于 1000 多个属种的 5000 到 6000 种植物，其中野花资源尤其丰富，为跷碛乡的中华蜜蜂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遗产地对社区潜在提供的直接生态服务的一个充分体现。

这一试点活动分为两个主要阶段：2017 年，项目团队在雅安市宝兴县跷碛藏族乡的泽根村和勒乐村启动了以高山养蜂为中心的社区可持续生计工作，扶植村民专业养蜂合作社，制定了蜂蜜生产流程和标准，为超过蜂农提供新式蜂箱中蜂养殖的技术支持，并推动合作社治理能力的提升。2018 年开始试点活动扩展到汶川县卧龙镇，重点培养宝兴和卧龙合作社自主治理和宣传销售的能力，用参与式科学监测的手段提升蜂农的生物多样性认知，挖掘本地嘉绒藏族文化和语言中和蜜源植物相关的知识。项目尤其重视促进女性了解和参与养蜂及合作社的决策，提升妇女对自身在社区发展和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的认知和参与。2019 年，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策引导下，项目开始依托遗产地生态资源和养蜂可持续生计在卧龙开展自然教育尝试，以期更好地提升遗产地生计的韧性，并为卧龙的自然教育规划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 1.1.1. 雅安片区

雅安市宝兴县的跷碛藏族乡地处川北高原，东邻汶川，位于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遗产地内。全乡为宝兴河发源地，源头为夹金山国家森林公园组成部分。跷碛乡海拔较高，大部分区域位于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遗产地的核心区，全乡境内居住着藏、汉两个民族，其中藏族占总人口的 95% 左右。其中海拔最高的两个村落泽根与勒乐两村属于遗产地核心区和缓冲区交界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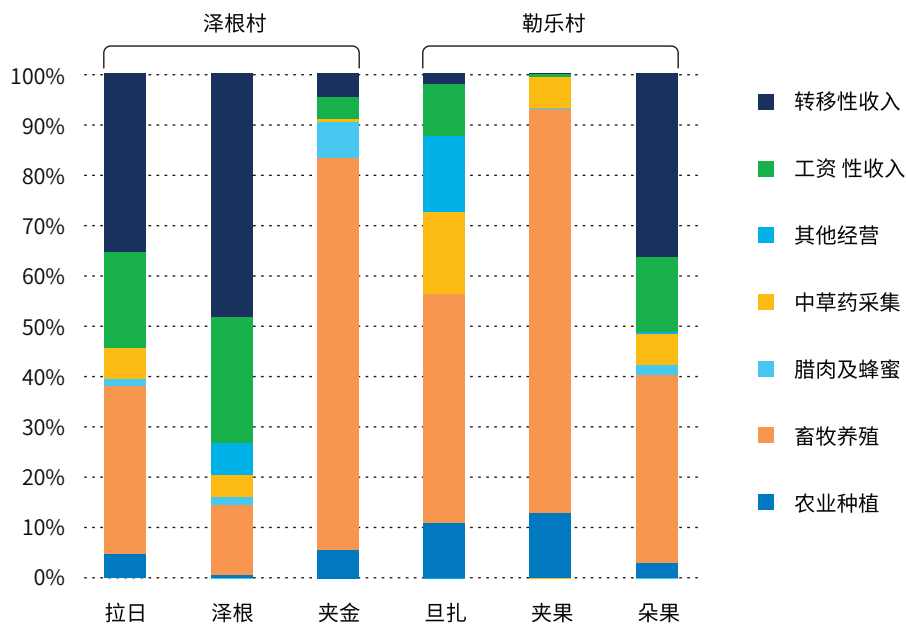


图 2-6 泽根村和勒乐村六个村民小组收入结构

根据项目在地调查团队 2015 年 1-2 月在两个村开展的调研，2014 年两村月人均净收入 2900 元。过去传统农业种植和高山畜牧是当地的主要生计；2007 年碛碛水电站完工淹没了部分农田，搬迁农户开始发展农家乐旅游成为主要生计之一。而从整体来看，传统农业和畜牧养殖依然是两村居民的最主要生计，其次是转移性收入，这其中也包括碛碛水电站给部分农户的补偿。农业收入普遍不高，当地农户主要种植少量玉米和土豆等自己食用或作为饲料。部分农户曾经尝试过核桃、花椒、苹果和菊花等经济作物和林木，但总体效果不佳。一部分村民小组有劳动力在当地和外地打工。因海拔高，位置偏远且交通不便，特别是地震后次生灾害对交通和过路游客量的影响，两村居民参与旅游业的程度均比较低。除泽根和扎旦两个村民小组有小部分旅游接待收入外，其它村民小组以销售腊肉和蜂蜜等土特产为主。

有关占据村民收入绝大部分的畜牧养殖，从 1990 年代末到最近，受访户的总放牧牲畜头数几乎增长了一倍（从 1425 到 2777，见图 2-7），平均每户头数从 16 只增长到 32 只，平均每户养殖牦牛头数从 9 头增长到 13.5 头。58% 和 28% 的放牧受访人（一共 76 户）表示他们的草地退化非常严重或比较严重，几乎所有人都提出过度放牧是导致当前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造成的影响已经很显著，并当前的状况感到忧虑，希望在多个方面得到帮助和支持。此外，由于长期放牧导致高山草甸退化，部分村民已经将牦牛放养到与该村毗邻的卧龙自然保护区境内，对高山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长期保护造成了潜在危害。因此，亟需在在保障周边草甸和森林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下，对目前两村的生计模式进行有效的调整和生计，提高村民的生计发展能力和对遗产地的保护意识和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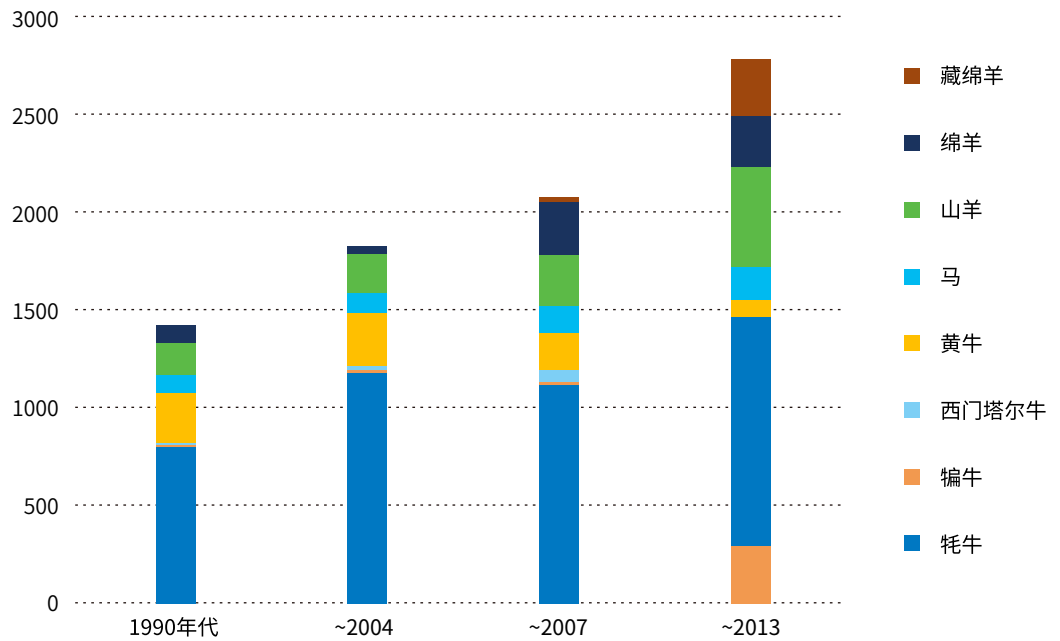


图 2-7 受访户养殖牲畜数量变化

## 1.2. 卧龙片区

自 2016 年国家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将研学纳入中小学教育计划，自然教育作为最主要的和最受欢迎的研学内容得到迅速发展。文化旅游也在近年开始朝着创意性方向发展。其中生态文化旅游做为在常规文化旅游上融入生态文化的新形式，也成为了文旅一条具有创新空间的路径。2019 年 4 月 1 日，国家林草局在国家公园试点框架下，又颁布了《关于充分发挥各类自然保护地社会功能大力开展自然教育工作的通知》，指出自然教育是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效途径，能推进林业产业转型和升级，林区振兴发展，以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文件也同时指出自然保护地，尤其是世界自然遗产或自然文化双遗产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载体，能发挥出独特的自然教育优势。因此大力鼓励和推进自然保护地，教育工作者，以及社会团体联合探索多元化并具有地域特色的自然教育形式。同时，自然教育做为新兴行业，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一方面行业整体人才缺乏，而另一方面存在在自然保护区没有深入和公平地纳入当地社区居民参与，从而不能充分利用社区生态文化带动当地可持续生计发展的现状。

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暨大熊猫国家公园阿坝管理局位于四川大熊猫遗产地核心区。当地的大熊猫保护，完整的高山生态系统，以及本土藏羌社区的特有生态文化使得卧龙成为独特的自然教育开展地点。近两年因灾后重建道路恢复，卧龙的旅游以及自然教育也得以迅速发展。目前卧龙保护区管理局及体系下的卧龙自然博物馆，保护站点，旅游局，社会发展局做为当地自然教育开展的主体，正在积极在已有的自然倡导体系下探索新的自然教育以及研学课程。



## 2. 项目开展

在对遗产地高海拔区域的宝兴县硃碛乡进行了详尽和严谨的社会及生态调查的基础上，2017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在《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和管理》项目三期框架下启动了四川大熊猫栖息地雅安片区养蜂可持续生计活动，并以蜜源植物监测为切入点引导当地蜂农和社区居民自主参与遗产地生物多样性监测和生态保护。2018年，基于雅安片区养蜂可持续生计经验的成熟和合作社建设的完善化，项目将试点区域进一步拓展至卧龙地区。试点项目在当地直接受益 1014 人次，其中女性 522 人次，占比 51%。

### 2.1. 养蜂可持续生计

项目团队参考国内最先进的可持续农林产品生产体系和销售平台标准，开展遗产地生态友好型蜜蜂养殖及蜂蜜生产的流程和标准制定工作，在此基础上先后成立了硃碛“仁娜斯巴”和卧龙“熊猫谷”养蜂合作社，并推动两地合作社间开展互访与交流。项目强调合作社员能力建设和拓展销售渠道，长期开展养蜂可持续生计社区培训，培训内容涵盖蜜蜂养殖监测、蜂蜜采集灌装销售、合作社治理等各个环节，并根据试点地实际情况采取冬季养蜂培训、农民夜校等多样化的形式。共计培训 546 人次。同时为帮助合作社拓展销售渠道，真正实现社区生计的改善，2018 年，项目团队协助仁娜斯巴养蜂合作社开设了微店、上线蜂蜜产品。2017-2020 年项目下扶持的养蜂合作社共生产符合合作社标准蜂蜜 1614 斤，毛收入 57348 元。2020 年 8 月，在项目团队的支持下，仁娜斯巴养蜂合作社成功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商标注册证明，迈出了自主品牌的第一步，这一成果将有助于合作社高山蜂蜜产品的进一步营销和推广。



→  
硃碛乡女性藏民参与养蜂  
© 雅安市遗产办



## 2.2. 遗产地生物多样性监测和生态保护

项目团队积极引导社区居民成为遗产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者，制定遗产地蜜源植物监测方案，并定期组织蜂农和当地群众利用智能手机拍摄并记录蜜源植物。以蜂农以及社区相关人员拍摄的上千份蜜源植物照片和视频为素材的《硃碛蜜源植物手册》和《野外识花手册》一方面为蜂农开展养蜂提供了参考，另一方为作为图文并茂浅显易懂的读物也为青少年提供了了解遗产地生物多样性的渠道。





← 硃碛乡村民用智能手机拍摄  
蜜源植物 © 汶川熊猫乡土  
绿色发展中心

### 2.3. 自然教育

在 2018-2019 年项目中，四川大熊猫遗产地地区面临了极端多雨天气，项目两地合作社蜂蜜产量及收入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一困难显现了在气象异常和灾害情况下高山蜜蜂养殖生计单一收入来源的脆弱性，包括合作社在面对极端天气下的蜜蜂养殖技术和综合管理水平的潜在不足。为了进一步提高项目地社区和合作社对生态友好生计的认知，以及合作社面对气象灾害的韧性，2019 年 -2020 年项目将继续在硃碛乡和卧龙镇两地继续稳定提升高山蜜蜂养殖水平，以及探索以生态友好型高山养蜂为基础的自然教育生计的可能性。

2019 年，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策引导下，项目开始依托遗产地生态资源和养蜂可持续生计开展自然教育尝试，这一新增内容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19 年 4 月 1 日发布的《关于充分发挥各类自然保护地社会功能大力开展自然教育工作的通知》精神相契合，并能够为卧龙的自然教育规划提供有益的经验 and 政策建议。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2019 年项目下协同卧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共同主办了国家公园自然教育与社区发展交流研讨工作坊暨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社区可持续生计项目汇报会。在多方咨询的基础上，以卧龙当地合作社高山养蜂生计为基础设计了包含养蜂模块、蜂场生态系统监测模块、室内游戏或手工制作模块在内的自然教育课程。2020 年 5 月 20 日起，组织 34 人次养蜂合作社社员和遗产地社区青年进行自然教育能力建设

2020 年暑期自然教育活动中，小学生们在社区机耕道观鸟 © 汶川熊猫乡土绿色发展中心



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自然教育核心概念、开展自然教育的目的以及课程、活动和人员配置。组织 4-6 年级小学生开展了 8 期以“熊猫求生记”为主题的自然教育活动，并在暑假期间，与足木山村居委会联合组织卧龙关、足木山、转经楼三个村社区的孩子开展 5 期“夏日的记忆”暑期自然活动，活动形式包含观看自然纪录片、社区观鸟、手工制作、自然游戏等。活动共开展 13 次，累计参与 230 人次。

经过三年的试点项目执行，雅安和卧龙两地社区依托遗产资源发展可持续生计的能力得到了长足提升。在雅安硃碛，当地藏民在在地团队的引导和支持下，成立了自己的养蜂合作社，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合作社管理制度和蜂蜜质量标准，成功申请到了商标，独立运作起了网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地的养蜂合作社社员从一开始的男性为主，到后来社员家庭中的女性成员也开始逐渐参与，到 2020 年女性在合作社中的参与度超过了 60%，真正实现了社区赋能、女性赋能的目标。在卧龙，自然教育搭建起了遗产地和青少年之间的桥梁，让当地小学的孩子能够在快乐中认识遗产地的价值，帮助文化和遗产在下一代中更好地传播与传承。

### 3. 经验与展望

通过梳理项目活动和成果，归纳总结出以下几点主要经验，以为同类型项目发展提供参考，特别是为自然遗产地管理保护以及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协同发展提供借鉴。

- 通过合作社员能力建设，建立遗产地生态友好型中蜂养殖和蜂蜜的生产体系，使当地合作社初步具备了产品化、网络化销售能力以及自我管理能力，有效提升合作社营销能力和遗产地可持续生计韧性。
- 通过社区参与式生态监测，培训合作社成员监测蜂场周边开花植物和野生兽类，补充完善了基础生物多样性数据，加强了合作社和村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知，有效提升环保和社会效益。
- 依托遗产地生态资源和养蜂活动、结合生物监测结果和国家政策导向，将自然教育作为探索长期可持续生计的重要模式，引导公众广泛参与自然保护事业，推动自然教育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 注重项目传播的维度、广度和深度，借助网络和社交媒体，提升社会公众对遗产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拓展公众社会公众参与遗产地可持续生计、生态监测、自然教育的途径，提高项目的影响力和能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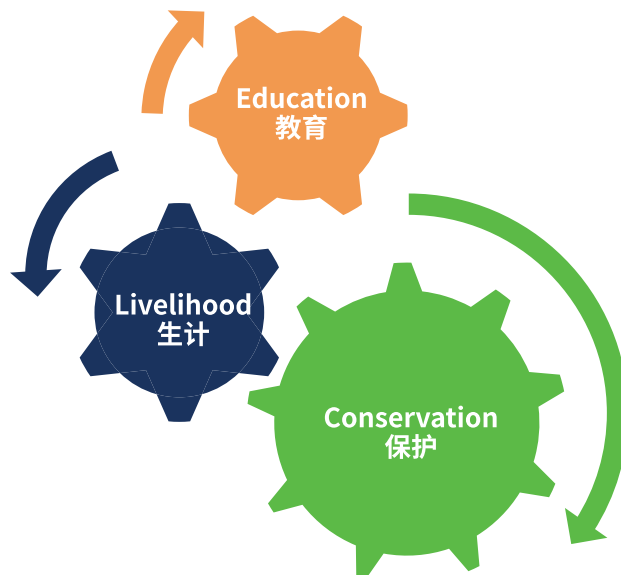


图 2-8 生计 - 保护 - 教育促进遗产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区发展

项目地各项活动的开展，将生计、保护、教育三大领域作为切入点，促进了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遗产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区发展。随着国家加大对保护地区的扶贫、保护的政策支持，未来在遗产地可持续生计活动的框架内，进一步整合各项活动，形成养蜂可持续生计、生物多样性监测和自然教育互相支持、正向反馈的综合体系，是进一步开展项目活动的重要指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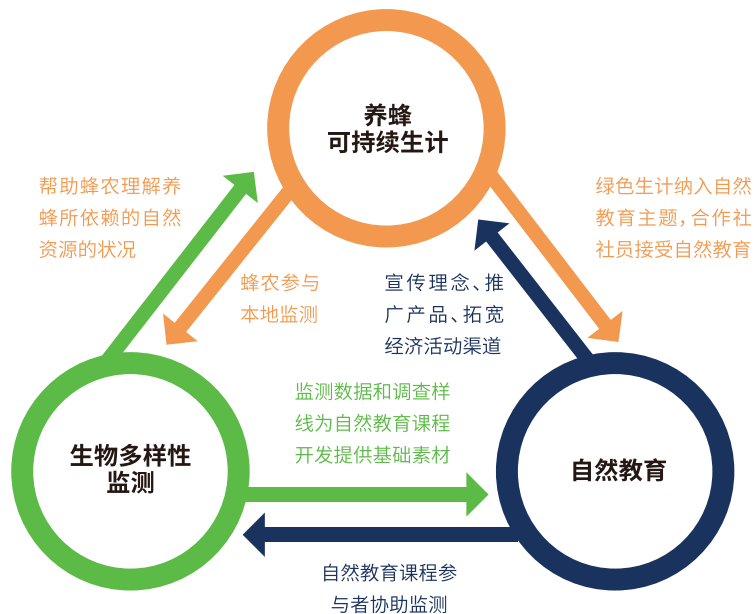


图 2-9 养蜂可持续生计、生物多样性监测和自然教育综合体系

养蜂可持续生计的提升，一方面引导和培训蜂农参与本地生物多样性监测，针对蜂场及周边区域开展更有规律的监测体系，从而更精确地反映区块的生态环境变化；另一方面，高山养蜂为绿色生计相关的自然教育课程和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采蜜体验、蜂蜜产品制作等相关活动也可以有效提高自然教育的趣味性。

生物多样性监测的体系建立，一方面可以帮助蜂农理解养蜂所依赖的自然资源的状况，加强养蜂合作社的能力建设；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监测数据可以为自然教育课程开发提供基础素材，调查样线也可以作为自然教育活动设计的参考。

自然教育的长期持续开展，一方面可以引导课程参与者加入生物多样性监测，作为自然保护区常规监测和蜂农参与的本地检测的重要补充，形成一个更广泛的公民科学监测体系；另一方面，通过纳入更多元化的群体，自然教育活动可以作为宣传可持续生计理念、推广可持续升级产品的载体，提高养蜂可持续生计的可见性和影响力，自然教育产业也可以作为养蜂生计的眼神，进一步拓宽养蜂合作社的经济收入渠道。

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载体，是体现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要形式，具有开展自然教育无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养蜂可持续生计、生物多样性监测和自然教育的统筹推进，辅之以必要和多元的传播途径，将对建设生态文明，推进遗产地社区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教育、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中德文化交流期间与德国  
遗产管理人员交流 © 昂贵

## 2.5. 促进国际社会参与

### 案例五：全球多边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文化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德文化交流“遗产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

#### 1. 文化交流背景

文化在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5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文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纳入国际发展框架中，这是文化首度在国际发展议程中被提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11.4：“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集中体现了文化的关键作用，此外，文化在优质教育、性别平等、经济增长、保护环境、建设包容与和平社会等其它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自然与文化遗产、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创造力、文化与创意经济、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包容等文化要素互联互通，共同塑造了文化认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将文化的各方面整合起来并形成协同效应并非易事，需要建立更紧密的跨领域、跨国多边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在努力通过全人类共享的遗产力量将各国和人民团结在一起，并通过联系过去与未来拓展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在此过程中 1972 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

产公约》、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的互联互通不仅体现在不同领域之间，也体现于不同地域之间，各国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可以激发共同的努力与智慧，使文化和遗产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持续动力。中德之交源远流长，中国和德国有许多共同利益，并建立了高级别政治合作框架。在文化领域，中国与德国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与丰富的遗产，也有着共同的需求。两国都非常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中国一直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大项目和计划，在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与教科文组织进行持续且坚定的合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财政和智力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德国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重视也在德国政府的四年计划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全球化和转型在促进经济发展并为不同群体之间创造新的对话的同时，也为两国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带来了相似的挑战，遗产保护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使得世界遗产地肩头的经济、人口和就业压力愈发沉重，进而导致遗产保护效率降低和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应对这一全球性的遗产保护与管理问题，既需要在地方的积极探索，也需要全球的多边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更广泛和深入的文化交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和管理》项目三期框架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德文化交流于2018年9月26日至29日在德国柏林和勃兰登堡州举办，这一交流活动展现了全球多边合作伙伴关系推动遗产保护和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潜能，反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心和全球社会的共同希望，即寻求将文化和自然遗产、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有机统一的方式和机制，以实现建设和平、消除贫困、促进文化间对话，并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实现做出贡献。

## 2. 文化交流内容

此次中德文化交流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主办，德国遗产管理研究所承办，并得到了德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德国文化部和德国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的支持。此次交流旨在促进中德及其它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专家和相关从业者的有效交流和沟通，分享各自在“遗产保护助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经验，匹配两国专业经验，进行跨国和跨学科的案例研究，探讨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创意经济三个领域如何协力促进可持续发展。

参加交流的中方人员包括来自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代表，以及遗产专家、世界遗产地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等。在为期五天的交流中，代表团与柏林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就世界遗产管理实践进行了交流，并与德国文化和媒体事务联邦委员会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以及勃兰登堡理工大学遗产研究项目的学生进行了讨论。同时，也访问了多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遗产地和保护区，包括柏林博物馆岛、波茨坦王宫和园林，施普雷瓦尔德人与生物圈保护区，以及柏林“设计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并与德国同行讨论了遗产保护和创意与可持续发展等。此次交流还包括了为期一天的“遗产保护助力可持续发展”研讨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亚太部主任景峰博士、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文化处公使衔文化参赞陈平先生、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科学文化处一级调研员乔正顺先生、德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卢茨·穆勒博士致辞和德国遗产管理研究所执行主任布丽塔·鲁道夫博士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德两国来自不同部门的代表在研讨环节从政策、实践、案例与经验分享等层面分享和讨论了两国遗产保护管理的经验，丰富了两国遗产相关人员的相互理解，激发了两国遗产相关领域的新思考和新合作。以下为此次文化交流的简要概述和总结：

## 2.1. 两国遗产保护管理体系和现状

由于政治体制和国情的差异，中德两国形成了不同的遗产保护管理体系，在体制建设方面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探索和长期不懈的努力。此次文化交流活动中，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亚太部主任景峰博士（中）、中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科学与文化处调研员乔正顺（右一）与中国南方喀斯特云南石林代表合影

化遗产司王晨阳副司长、中国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世界遗产司）辛沪江副巡视员、德国联邦文化传媒国务部文化遗产委员会比约恩·贝纳特先生和德国遗产研究院布丽塔·鲁道夫博士分别介绍了中国和德国遗产保护管理的现状、面临的挑战与采取的主要措施。

中国于 1985 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截至 2021 年已有 56 处世界遗产地，遗产数量多、类别齐全。中国的 14 处世界自然遗产和 4 处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大多分布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具有分布范围广、遗产地面积大、监管难度高、保护专业性强、遗产保护与地方发展的矛盾尖锐等特点。经过探索，中国建立了自然遗产依托自然保护地管理的机制，利用自然保护地的法律法规实现对世界自然遗产、双遗产的科学保护和有效监管，同时建立了由国家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遗产地管理机构构成的三级管理体系。在夯实遗产资源保护方面，中国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优先，完善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相关的法律、制度和规定，全面保护自然遗产地的重要自然资源；通过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等重点生态工程，加大对自然遗产地生态保护和修复的支持力度；加强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监督管理，坚决杜绝遗产地出现盲目利用和过度开发的行为，防止资源退化和生态破坏，切实维护遗产地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在妥善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方面，突出世界自然遗产的国际性和公益性，协调各方加大对遗产地及所在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支持力度，提高自然遗产地自我发展能力，进一步减轻经济社会发展对遗产地资源的依赖；坚持生态为民、科学利用，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遗产地与周边社区的关系，加快建立多方合作共赢机制，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使遗产地所在区域及周边社区群众公平地获得可持续发展机会，提升各方面保护自然遗产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中国 38 处世界文化遗产涵盖了广泛的类别，包括纪念碑、建筑群、文化景观、历史城镇和遗产路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基础上，中国文化遗产的管理由国家文物局全面统筹，下设世界遗产处统筹全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保护、管理等工作。各级地方政府都有一整套有效的法律法规体系，以确保世界遗产及其缓冲区的保护。地方当局在常规管理活动中发挥核心作用，分配人力和财政资源。对于系列遗产和跨省遗产，如跨越 8 省 35 市的大运河，各相关地方政府建立了跨部门协调和协商机制。2000 年发布、2015 年修订的《中国遗产地保护原则》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经验和思考进行了总结和出版。

自 2006 年以来，国家文物局发布了一系列管理指南，以支持世界遗产的监测系统建设。2012 年，作为国家文物局直属的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着手建设“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系统”。在多年的积累和努力之下，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内设机构于 2015 年正式成立并独立开展工作，这一国家级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保护、研究中心和平台的建立，对提升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管理水平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的文化遗产法规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法规

中国政府一贯致力于执行《世界遗产公约》，为应对世界遗产保护和发展面临的新挑战而采取的几项主要措施：

- 政府主导的遗产地环境和生计改善，包括基础设施、绿色和文化设施以及旅游业的发展；
- 协调系统，协调不同部门的利益，包括建筑、宗教、旅游和遗产保护；
- 通过能力建设和直接参与遗产地的恢复和发展项目，实现公众参与；年轻一代的遗产教育受到优先重视。

简而言之，无论是自然遗产还是文化遗产，政府都在中国遗产保护管理体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在基础设施、绿色和文化设施以及旅游业发展等方面主导着遗产地环境和生计改善。在政府的统筹协调下，进一步建立协调不同部门利益的协调系统，并通过能力建设和直接参与遗产地的恢复和发展项目实现公众参与和遗产教育。近年来，中国努力提升遗产申报管理水平，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沟通与合作，科学组织开展遗产申报工作，完善专家参与咨询和决策机制，强化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的培育和预备项目库建设，实施动态更新和管理，以适应世界遗产事业发展趋势。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目前中国遗产自身的价值特征保持良好，申遗承诺履行情况基本稳定，机构与能力建设现状较好。

与中国由政府主导的遗产保护管理体系相比，德国的文化与遗产管理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包括欧盟、联邦政府、州政府等不同层级以及政府机构、公民社会、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



代表团受邀访问柏林纪念物管理局，局长兼柏林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夫·劳胡特博士介绍管理局的使命和职责 © 昂贵



织等不同主体的影响。在欧洲层面，尽管欧盟在文化和遗产领域的能力有限，通常局限于财政支持、项目协调、合作倡导和知识共享，但这些宏观层面的职能提升了欧洲各国保护与修复遗产、推进相关技术研究（如三维重建）的意识。在联邦政府层面，德国发展各个历史时期的法律法规都包含了历史遗产保护的相关内容。自 1998 年以来，德国文化和媒体事务联邦委员会（Beauftragte der Bundesregierung für Kultur und Medien, BKM）开始承担电影、纪念物保护和文化基金会等文化职能，并作为一个平台促进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沟通。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州政府在德国遗产保护管理体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德国《基本法》规定各联邦州拥有“文化主权”，文化保护原则上是各联邦州自己的事务，各州均针对遗产保护专门立法，并设置纪念物管理局（Monument Authority, Landesdenkmalamt）负责遗产及文物的维护。在此基础上，城市、乡镇和区县负责具体规划如何促进和保护文化，并为相关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和公共设施。

除各级政府外，基金会、协会以及私人筹措和企业捐助是德国遗产保护管理体系中的重要主体和资金来源。例如，1985 年成立的德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是德国最大的遗产保护私人基金会，投入了约 5 亿欧元用于保护和修缮 5000 多座纪念物。此次交流活动中，代表团参观的波茨坦和柏林的宫殿和公园世界遗产地也是由“柏林 - 勃兰登堡普鲁士宫殿和园林基金会”管理，该基金会于 1994 年成立，名下管理着柏林和勃兰登堡州界内大约 150 处历史建筑物和近 750 公顷的花园和公园，通过一系列环境规划、区域土地利用规划和建设规划与包括勃兰登堡州、波茨坦市、国家历史遗迹保护办公室等在内的多家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教会、学校、民间团体和个人作为文化承载者也在德国的遗产保护和管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德国宪法中确保宗教优先权的条款，教会组织在管理其物质与非物质的宗教遗产方面拥有自主

权。包括大中小学在内的学校也通过支持学生参与各种业余文化团体及活动，以达到宣传和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如北莱茵州的帕德博恩 (Paderborn) 大学设有德国第一个“UNESCO 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社会上的各种民间团体也以协会等形式活跃在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简称“非遗”）作为重要文化资源推动区域振兴和创意产业发展的作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中德两国都有丰富的非遗资源，并积极拥护和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非遗领域开展了许多工作。

中国是最早一批于 2004 年 8 月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国家之一。根据这一公约，国务院共列入 5 批次 10 个类别 1557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反映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国情，体现了多元的中国传统、知识和实践根植于漫长的历史发展，并代代相传。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非遗保护工作，在文化和旅游部（下简称“文旅部”）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负责非遗保护的政策制定和相关管理工作，并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社会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初步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制度，非遗保护工作呈现了良好的局面和发展态势，主要的政策和实践包括：

### 1) 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下简称《非遗法》）

《非遗法》于 2001 年正式颁布施行，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非遗保护、保存工作列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了国家、省、





中国国家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一级巡视员王晨阳（左） © 卢叶 / UNESCO

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并给予各级财政支持，为开展非遗普查、申报、传承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和财政保障。各地方也基于《非遗法》相继出台了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

## 2) 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2005年，文化部（现文旅部）部署了全国非遗普查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我国非遗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清点了约87万项非遗，深入社区、乡村，上千万人参与，有效提高了公众意识。

## 3) 建立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制度

为确保非遗的传承性，先后命名了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计3068人。由于非遗传承人中的老年人比重高、去世人数不断增加，2013年文化部启动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试点工作，并于2015年全面开展，将代表性传承人掌握的丰富知识和精湛技艺进行全面、完整地记录，以口述片、项目实践片、传承教学片等形式予以保存，服务于遗产的传播研究等活动。

## 4) 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

选择非遗资源丰富集中、历史悠久、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区，以保护非遗为核心进行整体性保护。截至2020年6月，我国设立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7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17个，涉及省份17个。

## 5) 实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文旅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以传统工艺项目为重点，利用高校学术和教学资源支持，

帮助传承人加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提高对造型艺术和相关材料、技术的把握和运用能力，了解现实生活中人们审美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找到传统与现实融合的切入点。截至 2019 年 6 月，全国有 110 余所高校积极参与研培计划，已举办研修、研习、培训 670 余期，培训传承人群近 2.8 万人次；加上各地延伸培训，全国参与人数达 9.7 万人次，成为中国非遗保护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

由上述举措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已逐渐超越了政府、官员和专家的管理，成为包括政府、市场、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同责任。

和中国集权化和行政化的文化管理模式不同，由于德国的文化政策更加关注文化遗产的公共化和社会化，即将文化遗产看成是属于社会的公共财产，德国的非遗保护也相应地更加强调社会力量特别是私人 and 民间团体的支撑。在非遗教育中，正规的与不正规的、正式的与非正式的习得同等重要。一方面，非遗在学校教育和跨文化学习中占有一席之地，被视为一般性教育和终生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另一方面，强调社会对于非遗的广泛接受和互动，认为礼仪、舞蹈、游戏、节庆等非遗和亲身实践这些非遗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应是密切、清晰和持续的，非遗项目、非遗实践者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共同构成了文化记忆与认同并不断更新。从这个角度来看，非遗应该是常新的，并通过公民自发组成的组织、协会和团体被习得和传承，



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苗绣非遗传承人伍前金（左一）展示苗族刺绣  
© Felipe Echeverri Velasco

这种文化传递的方式拥有改变的潜能，从而造就了文化绵延的生命力。受这一观念的影响，德国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对待非遗的保护和博物馆化，防止活态的非遗文化变得僵化或非遗名录遭到滥用，避免商业性的或者偏离正确政治轨道的活动被选入非遗名录。在德国，非遗保护的任務主要由各州的文化保护协会来承担，州政府则通过财政拨款的形式为其保护和促进地方文化发展提供运营经费。

近年来，公共利益和公众参与成为了中德两国遗产保护管理相关体系建设和政策设计的共同重点。在中国，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被国务院指定为“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日”，2018年遗产日期间，全国开展了3700多项大中型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包括互联网在内共有2.6亿人次参与，为提高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认识、欣赏和促进遗产保护提供了重要机遇。类似地，在2018年“欧洲文化遗产年”中，德国将“共享遗产”作为口号，通过公众参与的方式促进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并鼓励跨国文化交流，在“共享遗产”的框架内，各种各样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实施了400个项目和1300项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建立了对遗产价值的共同认知和共性阐释。中德文化交流中的经验分享和思维碰撞，使两国更加坚定了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要以共享和参与为核心，全面覆盖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并大力推动文化遗产教育，激发年轻一代的兴趣。

## **2.2. 两国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探索**

随着遗产的重要性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成为相关部门的中心议题。遗产一方面反映并表现了长期以来人类与其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关系，以及人类与地球和宇宙是如何息息相关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并体现了人们对待其他生命形式的态度和看法、在自己所处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关系、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以及为维持并提高其生活质量而遵循的价值观。遗产与人类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并完全融入社会、经济、环境发展过程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推动遗产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国际性的机遇和挑战，中德两国也都进行了一些新颖的尝试，并在交流活动中介绍了相关的做法和经验。

通过实地考察和会议研讨，代表团成员直观而深入地了解了德国在博物馆岛世界遗产地、施普雷瓦尔德人与生物圈保护区以及当地索布族社区采取的一系列以遗产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探索。研讨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项目官员卢叶分享了遗产保护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经验，并由来自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代表李忠平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奥地利）的刘伟对中国云南和四川世界遗产地开展的可持续生计活动进行具体阐释。为了充分展示中国非遗的独特魅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知名昆剧演员张军通过表演选段、讲述案例等方式，呈现了昆曲非遗的传承性、创新性与包容性。



抵达柏林后，代表团首先参观了位于市中心的博物馆岛。博物馆岛于199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柏林老博物馆 (Altes Museum)、新博物馆 (Neues Museum)、国家美术馆 (Alte Nationalgalerie)、博德博物馆 (Bode Museum) 及佩加蒙博物馆 (Pergamon Museum) 组成，它不仅仅是五个博物馆建筑的集合，更是一个与非物质遗产密切相关的整体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当代博物馆综合体，该遗产地每年接待 300 万游客，对展览设施更新和空间拓展不断提出新的要求。除了遗产地核心区和缓冲区内部的建设需求外，博物馆岛的保护管理还面临着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如遗产地周边的交通和停车问题、附近高层建筑开发破坏



交流活动之“中国非遗昆曲表演”，图左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张军先生（左） © 卢叶 / UNESCO

了遗产地视觉完整性等，这些议题都需要开展全面的遗产影响评估。为此，博物馆岛通过了一个总体规划和一个博物馆岛保护管理计划，并建立了相应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建立对遗产价值的共同认可和共性阐释，优化遗产相关的资源配置，以应对遗产保护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

在施普雷瓦尔德，两国代表聚焦旅游、刺绣和非遗，展开了深度交流。施普雷瓦尔德属于德国勃兰登堡州，距柏林 100 公里，1991 年被指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保护区，拥有 1575 公里长的水道，形成了蜿蜒曲折的独特水畔景观，其中 276 公里的水网用于旅游，每年接待约 300 万的游客。施普雷瓦尔德是各种动物和植物物种的栖息地，也是索布族的聚居地。索布族是西斯拉夫民族，人口约 6 万，自 6 世纪以来就定居在施普雷瓦尔德，由 200 多条小运河组成的河流网络成为了索布族居民的传统灌溉系统。当地旅游业的繁荣除了依托保护区内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环境之外，更得益于当地索布族社区的积极参与对游客旅游体验的丰富和拓展。当地索布族社区生产本地品牌农产品，如施普雷瓦尔德小黄瓜、夹克土豆、亚麻籽油（被誉为施普雷瓦尔德黄金）和普林斯（索布语中的鸡蛋发面饼）等，为当地旅游业增添了风味，并创造了必要的收入。此外，当地依托密集的水网提供各种各样的运动和休闲活动，如骑行车道、独木舟、皮划艇和传统的平底船，使游客得以近距离感受风景如画的溪流、浪漫的传统村庄与黄瓜田地。

代表团与德国施普雷瓦尔德人与生物圈当地索布人交流 © Felipe Echeverri Velasco



除了参观施普雷瓦尔德蓬勃多彩的旅游发展之外，非遗专家和传承人也就当地社区如何推动旅游业发展并从中受益，以及如何加强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之间的联系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作为德国联邦政府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之一，索布族拥有各种传统习俗和节日，是该地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索布人身份和文化自我实现的重要特征。2014年，索布族习俗和节日被列入德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除了在政治层面对当地少数民族群体的权力予以保护之外，当地居民、社会组织、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在索布族非遗保护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如建立了索布族文化研究所（Serbski Institut）和档案馆，致力于索布族文化的研究、展示和意识提升，并试图通过古为今用的方式保护非物质遗产。在交流活动中，代表团参观了索布族非遗传承人克里斯塔·吉乌布拉的传统索布族刺绣工作坊，索布族人在节日庆典时通常会穿戴有刺绣装饰的传统服装和兜帽，在手工艺术人的巧手之下，色彩斑斓的花型被一针针点缀到索布人的传统服饰上，成为一门绽放在指尖的艺术。游客们可前往传统服饰刺绣工厂等场所，了解索布人传统服饰的生产过程和手艺人倾注的心血，购买手工打造的传统服饰零部件、全套传统服饰、身着传统服饰的木偶等纪念品。交流活动中，来自中国少数民族苗族和彝族的刺绣非遗传承人与索布族刺绣传承人就不同的刺绣方法进行了有趣而深入的交流，保护区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相关经验也为来自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的代表团成员带来了许多启发。

在参观施普雷瓦尔德人与生物圈保护区以及当地索布族社区之后，代表团在“遗产保护助力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也对德国通过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实现区域振兴的经验进行了进一步交流讨论。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近年来大力倡导在乡镇区域发展文化旅游，并在全国设立了6个示范区，旨在让包括博物馆、艺术节、宫殿城堡以及民族手工艺和传统习俗等在内的



中国南方喀斯特云南石林代表（撒尼刺绣）与德国斯普瓦尔德人与生物圈代表（索布族刺绣）交流技艺 © 卢叶/UNESCO

文化产品成为乡村振兴的推动力，于 2006 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雷根斯堡（Regensburg）即是其中的一个成功范例。这些经验也大大开拓了我国通过遗产保护实现乡村振兴的思路。

中方代表也在研讨会上分享了中国在遗产保护助力可持续发展领域具有代表性和开创性的探索与实践。为了应对商业利用优先于遗产保护给中国许多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自 2007 年起开展《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和管理》项目，通过建立多方合作伙伴关系，广泛惠及中国七个世界遗产地以及当地的遗产保护管理从业人员、企业家和居民。2017 年以来，在项目三期框架下开展了一系列可持续生计试点活动，以遗产地的绿色生态产品和文化创意手工艺品为切入点，联结文化和自然、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提供或优化社区的可持续生计方式，从而发挥文化和遗产在促进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来自中国云南石林和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遗产地的代表具体介绍了在两地开展的撒尼刺绣可持续生计活动和养蜂可持续生计活动，前者通过活化利用传统手工刺绣，以创意促进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后者则通过多方合作高山养蜂促进世界遗产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区发展。这些实践不仅为当地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创造了收入和就业机会，还解决了与人口迁移有关的社会问题，是中国通过遗产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代表性范例。



两国代表在“遗产保护助力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交流讨论 © 昂贵

在乡村振兴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文化处公使衔文化参赞陈平先生介绍了松阳案例和 2018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关于建设未来农村的展览。松阳是位于浙江省丽水市的一个有 1800 年历史的古老县城，至今仍留下了众多形态古朴、风貌依旧的古村落和历史文化遗迹。松阳县遵循“活态保护，有机发展”的理念，按照最少、最自然、最不经意的人工干预原则，最小化对当地传统和特色的介入，提炼每个村庄历史文化传统和特色产业，并邀请不同的青年建筑师对村落的传统建筑进行保护性改造，将现代的建筑理念融入传统建筑的采纳性再利用之中，并在当地居民的支持下实现了积极的文化导向的再开发。这种理念既受到当地村民的拥护，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观光、体验，同时也唤回一些在外地务工的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利用传统工艺创造新的产品。这些作品在柏林和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得到展示，受到普通观众、专业人士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此外，在此次文化交流中，中德两国代表还针对如何利用遗产和相关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城市更新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知识分享和思维碰撞，中德两国在文化和遗产保护领域的研究机构、专家和实践者之间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意识到两国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其积极成果将推动两国在各个层面进一步合作，共同促进以文化为导向的可持续发展。

### 3. 中德文化交流展望

#### 3.1. 世界遗产与可持续旅游

目前旅游业已经成为遗产保护的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刺激因素，但也给当地的社会和环境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应对旅游压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于 2011 年启动了“世界遗产和可持续旅游”项目，着眼旅游目的地，旨在整合旅游和遗产管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在《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和管理》项目框架内，于 2015 年组织了一次国际论坛（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论坛系列），并发表了一份关于世界遗产与可持续旅游的论坛纪要。在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与联邦自然保护组织和德国旅游协会于 2016 年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一项可持续旅游计划。他们出版了德国可持续旅游指标实用指南，并组织了一次全国可持续旅游目的地竞赛。此外，德国还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旅游发展战略和管理项目。在这一已建立的中德双边文化交流机制内，可以依托双方积累的有关旅游管理和世界遗产保护方面的知识和实践，进一步开展更为密切的合作和交流。决策者、专业人员和利益攸关方在项目一级的交流可以通过第一手经验，深入了解不同文化经济背景下的挑战和机遇。交流可以进一步相互补充和激励，激励双方携手寻找最佳解决方案。

#### 3.2. 世界遗产与乡村振兴和可持续生计

除旅游业发展外，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了世界遗产对包容性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贡献。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内，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优先事项。中国国务院于 2018 年 9 月正式发布了《乡村振兴五年规划（2018-2022）》。通过乡村振兴，有形和无形遗产在城乡一体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和旅游部鼓励和支持创造性地利用传统手工艺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减轻贫困和提高偏远农村地区的生活质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与中国政府合作，《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和管理》项目框架内，在世界遗产及其周边地区开展了可持续生计试点活动。

关于中国乡村振兴的关注和讨论在德国和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松阳的案例（通过乡土建筑的再开发振兴松阳县农村）和 2018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关于建设未来农村的展览是近期的两个成功案例。尽管德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尺度上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但如何平衡农村与城市发展也是二战后德国保护文化和自然环境的法律和制度建设的重要挑战。在案例研究方面，德国的人与生物圈保护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参考，它强调自然和文化景观的综合保护和发展，以重新连接城市和农村地区。

要在世界遗产地实现可持续生计，提高公众意识和促进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至关重要。教科文组织职能范围内的合作将对中德在人与生物圈、地质公园和文化交流领域的现有伙伴关系起到帮助作用，并增加其价值。德国全委会穆勒博士提出，教科文组织在德国始终致力于活化已列入的遗产地和非遗项目，以加强它们在和平、生活质量、文化间伙伴关系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倍增效应。在这种背景下，中德两国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进行交流和沟通是必要的，也是互利的。



两国代表在“遗产保护助力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交流讨论 © 昂贵

#### 4. 总结

此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德文化交流活动使中德两国的文化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及相关从业者汇聚一堂，搭建了一个创造性的文化对话和沟通平台，有效补充了中德两国已有的交流和合作，是文化领域建立全球多边合作伙伴关系的一次卓有成效的探索。在共同探讨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涌现出的一系列好经验、好做法，将进一步激发文化领域的新思考、新合作，有效推动可持续发展，让更多人广泛受益。

# 3

## 常见问题 Q&A

### **Q1: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哪些地方提到了文化?**

**A:**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通过标志着国际社会首次认识到文化作为发展推动力的重要作用。文化的作用最为直接地体现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中，即“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其中具体目标 11.4 特别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其它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明确提到了文化对优质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 4）、经济增长与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可持续发展目标 8 和 12）、环境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和 15）、包容与和平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 16）、性别平等（可持续发展目标 5）、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目标 2）和健康（可持续发展目标 3）的作用。

### **Q2: 为什么要强调文化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A:** 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横跨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文化和创意产业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 3000 万个就业岗位。跨文化交流和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是协调争端和构建和平社会的有力工具，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韧性的源泉，为应对包括贫困、提供优质教育、气候变化等关键性挑战提供了知识。文化关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以及我们向何处去，缺乏文化视角的发展必定是不可持续的。

### **Q3: 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A:**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所言，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正如生物多样性对健康的生态系统至关重要一样，文化多样性也是充满活力的经济和社会的命脉。文化多样性为丰富我们生活提供了无数的新想法和新观点，使我们可以共同成长、共同繁荣，为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尽管

文化多样性尽管必不可少，它也日益受到威胁。例如，中产阶层化和无节制的发展正在磨灭城市的独特印记，剥夺其社会多样性和活力。在世界各地，暴力极端分子以文化弱势群体为目标，破坏了有助于理解人类及历史间强大联系的共同遗产。为应对文化多样性面临的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努力促进文化间对话和相互理解，以期促成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国际和平、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保障之一的共识。

#### **Q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是什么？**

**A：**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UCCN）创立于 2004 年，致力于促进将创意视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因素的城市之间的合作。截至 2020 年，该网络由全球 246 个城市参与构成，涵盖手工艺和民间艺术、设计、电影、美食、文学、媒体艺术和音乐七个创意领域。这些成员城市共同肩负着同一使命：使创意和文化产业成为地区发展战略的核心，并且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 **Q5：城市与创意的关联体现在哪些方面？**

**A：**目前，世界上超过 50% 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到 2050 年，这一比重预计将攀升至三分之二。在发展过程中，贫困、不平等和环境恶化等挑战在城市尤为明显和尖锐。而另一方面，城市也是发展的引擎，通过汇集不同背景的人参与交流、创新与创造，为制定发展解决方案提供了繁荣的空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对城市更新和创新进程至关重要。文化和创意产业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创造了 3000 万个就业岗位，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3%。文化活动促进了不同社群之间的社会包容与对话，有形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城市身份与认同的组成部分，进而形成了归属感和凝聚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基于文化的可持续城市发展模式的相关工作植根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强调了文化作为发展推动力的重要作用。

#### **Q6：性别平等重要事项是什么？**

**A：**性别平等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两个全球优先事项之一，是教科文组织在教育、文化、科学、社会和人文科学以及传播等领域所有行动的基础。教科文组织通过双管齐下的方式推动性别平等，即开展有性别针对性的项目以及推动性别主流化，并通过设在总干事办公室下的性别平等司协调相关行动。

#### **Q7：为什么要强调文化在性别平等中的作用？**

**A：**性别角色和身份深受文化影响。正如文化在不断演变一样，性别角色和规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个人之间以及群体、社区和社会内部不断议定和再协商。参与遗产和创意的识别、保护、推广以及传承为这一对话和协商过程创造了重要的空间。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



信文化可以成为实现性别平等的有力工具，特别是通过扩大所有人的文化权利促进性别平等，包括获取、参与和促进文化生活各个方面的权利。此外，作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强调的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量，文化对于确保所有性别群体都能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并从中受益，从而进一步推动性别平等的实现而言，同样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Q8: 可持续旅游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A:** 如今每年有超过 12 亿人跨越国际边界，旅游业日益成为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增长、就业和收入的主要来源。世界旅游组织（UNWTO）的数据显示，旅游业占全球就业岗位的 1/11，约占全球服务出口的 30%，直接和间接地贡献了约 10% 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文化旅游占世界旅游收入的近 40%，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地往往是创造就业和地方发展的焦点。旅游业可能直接和间接促进《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关于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8、关于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2，以及关于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4。然而，如果管理不善，旅游业也会使遗产面临风险，破坏其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游客数量过多会破坏古代遗迹，保护不当也会使非物质遗产陷入危机。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旅游业方面的行动致力于将遗产作为真正可持续的旅游业的基础加以保护。

**Q9: 青少年和文化的关联体现在哪些方面?**

**A:** 保障青年人获取、享受和积极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已被写入国际法，是文化权利和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人必须参与文化生活，才能了解自己和他人的文化，这反过来会拓宽他们的视野，加强他们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并促进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此外，正如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确认的那样，文化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文化和创意产业代表着全球 3000 万个就业岗位，雇用的 15 至 29 岁的人比任何其他行业都多。目前有 7300 万年轻人面临失业，扩大进入文化产业的机会和支持年轻的文化企业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此，增强青年实现其文化权利的能力是教科文组织青年和文化工作的核心，青年是执行其六项文化公约的基础。

**Q10: 文化部门如何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A:** i. 倡导

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倡导活动和国家层面旗舰项目的开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成员国成功推动文化纳入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通过“文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倡议”的推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让《新城市议程》（2016 年 10 月第三届世界人居大会，厄瓜多尔基多）中更加凸显文化的重要地位。

ii. 政策框架和监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文化：城市未来》文化与可持续化城市发展全球报告旨在促进以文化为根基的城市规划、再生和发展。2005年公约全球监测报告《重塑文化政策》评估了文化政策对促进文化多样性和发展的贡献。

### iii. 伙伴关系动员

通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凝聚城市的力量，以文化为中心推动可持续发展。其他相关城市网络还包括世界遗产城市联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包容与可持续城市国际联盟（ICCAR）。教科文组织还广泛与其它如开发署、人居署、人口基金、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机构、非政府组织，国际专家和学术界合作。

### iv. 国际合作

201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各国政府与政策制定者，在中国杭州召开“文化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国际会议，并将组织一系列关于城乡联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发展的国际会议。

### v. 测量工具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文化统计框架（FCS）、文化促进发展系列指标（CDIS）、文化公约定期报告机制以及《2030年议程》特定背景下的其他监测机制和方法的基础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0年发布了《2030年议程》文化专题指标，并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合作，继续强化了现有的工具和数据衡量体系。

# 中国世界遗产 能力建设手册 6

## 探索文化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协同并进

促进保护和发展协同并进是当下国际与国内社会的共同诉求。中国作为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以及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不断加速的城镇化进程、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中,一直致力于平衡遗产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

当前,包括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中国十三五、十四五发展规划在内的国际国内发展议程都愈发重视文化活化利用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2017年起,联动国际国内发展议程和机构使命,以可持续生计为载体、中德文化交流为窗口,就遗产地保护和协同发展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本书介绍了国际与国内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以案例的形式总结了文化在消除贫困、促进性别平等、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提升世界遗产地韧性、推动乡村振兴中的巨大潜力。



**unesco**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